

# 建国十七年来 文教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 汇 编

申长燕

引律大

上海中医学院春雷编辑室  
上海工总司卢湾区教工大队  
上海市育才中学革命造反委员会

联合编印

一九六七年五月

# 目 录

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两条  
路线斗争大事记 ----- 1

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上两条路  
线斗争 ----- 26

高等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  
大事记 ----- 39

编后 ----- 62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热烈欢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 最 高 指 示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 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新北大《文化革命通讯》编辑部

### 前 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建国十七年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概括起来说，是一个政权斗争，是一个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文化领域是两个阶级首先必须争夺的阵地。试看十七年以来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何等尖锐，何等激烈，何等复杂，令人惊心动魄！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工农兵群众，灭资兴无，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任务而奋斗。这条路线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拥护，日益深入人心。

在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这些死抱着资产阶级僵尸不放的党内代表人物，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路线恨之入骨。它们上下勾结，彼此呼应，相互利用，结成反党集团，篡夺党政领导大权，以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他们配合国际上的反动思潮和逆流，只要一有机会，便纷纷出笼向我们进攻，或明或暗，或硬或软，或凶相毕露，手持大斧杀将起来，或化作美女，打着红旗反红旗。“树欲静而风不止”。解放以来，我们和他们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彻底破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无法确立。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我们向这条黑线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六三年以后的戏剧改革，直到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一场接着一场，一次比一次深入。我们劈开迷雾，扫清妖孽，捣碎阎王殿，揪出盘据在党中央和各部門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回顾十七年，壮志满胸怀！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让我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 ×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九五〇年三月，大毒草《清宫秘史》出笼，这部影片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

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却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胡乔木在中宣部一次亲自主持的会上说：这个电影不能批判，因为少奇讲过，这个电影是爱国的。

后来毛主席批评了胡乔木，说：这部影片明明是卖国的，为什么说是爱国的？，胡表面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承认了错误，但暗地里仍按刘少奇的黑指示办事，竭力阻挠对《清宫秘史》的批评。他以“措辞激烈”、“要修改”为借口，把仅有的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也扣住不发。这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第一次重大批判，就被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九五〇年，在夏衍主持下，大毒草电影《武训传》摄制完成，经周扬审定，公开放映。武训，是一个封建势力的奴才。清朝末年，他在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根本不去触动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对封建统治阶级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但是，电影《武训传》却把他写成“伟大人物”，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狂热地宣传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这部影片受到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和支持。

一九五一年二月，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国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五月十二日，周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打着“坚决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旗帜，攻击毛泽东文艺路线，大讲“表现爱国主义的伟大主题”，推卸制作和抛售大毒草《武训传》的罪责。

同时，他还一手泡制了夏衍的关于这部影片的公开检讨，经他审查批准先在北京见报，上海转载。

五月二十日，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表了。

毛主席尖锐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做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主席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号召大家群起而斗争。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经过毛主席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

八月八日，周扬改变策略，换了一付面孔，发表了“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其目的，旨在捞取政治资本，并掩护这株大毒草的制作者，压制别人的批评，妄图减轻罪责。

十月（左右），刘少奇对周扬作了整编文工团的“指示”：“文工团员就会扭扭秧歌，打打腰鼓，这样下去，是害了他们。文工团要整编，人员要大大削减，建立正式的剧团。文工团员很年轻，大部分让他们转业，或者上学，学工业、学科学、学艺术，不要这样混下去。”

一九五二年夏，周扬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传达刘少奇的黑指示。他打着整编的招牌，大砍大杀革命的文工团。从此以后，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最好的战斗组织文工团大批地被砍掉，代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所谓剧场艺术和专业剧团。革命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大批转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文艺队伍全盘保留。毛泽东思想的文艺宣传阵地，变成了传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大本营。

五月二十六日，周扬发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他反对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与思想改造，鼓吹“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合作”。

十二月，周扬在苏联文学杂志《红旗》发表文章，把叛徒肖洛霍夫歌颂反革命分子的小说《静静的顿河》以及《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吹捧上天。

一九五三年，刘少奇指使周扬在文化部党组会上特意传达他的意见：“中央负责同志也要看看电影，既然看了，免不了要发表意见，意见一传出去，就造成紧张。怎么办呢？我看以后中央负责同志对文艺作品发表意见，只要不是见诸正式文件的，都不要当成正式意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这样我们讲话也比较自由了。”公然叫嚣不听毛主席的话，真是狗胆包天！

四月七日，周扬在第一屆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作总结报告。布署削弱党的领导，加强“艺委会”的领导。

九月，周扬背着中央召开第二次文代会，会上周扬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他为《武训传》批判“纠偏”。为受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鸣冤叫屈。

九月，李希凡等人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批判了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冯雪峰、丁玲等人控制的《文艺报》压制批判，不予发表。李希凡等不得已才在《文史哲》上发表。事后，《文艺报》才转载此文，同时加了贬抑



改也改过了，过去干部在革命战争中也锻炼过了……”意思是天下太平无事了

一九五七年前后，彭真在一次报告会上谈到京剧《四郎探母》时说：“解放那么多年，大家觉悟都提高了，有谁看《四郎探母》会去当汉奸吗？这个戏演了有什么关系？”

这之前周扬的秘书鍾惦柴伙同邓拓、林淡秋等人抛出了策划已久的大毒草《电影锣鼓》，点燃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把火。

四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越来越猖狂，周扬为之呼好，叫嚷“春寒”已经过去，现在“要求感情温暖”，极力主张开放禁戏，让毒草大肆泛滥。

刘芝明也叫嚷《四郎探母》今天“已经不起什么坏作用了”。有人想看《杀子报》，“那就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开放鬼戏，坏戏。午台上一时乌云滚滚，群魔乱舞。

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资产阶级右派，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大肆向党进攻，梦想在中国制造第二个匈牙利事件。

周扬等人极为活跃，召开一系列会议，上串下跳，呼风唤雨，煽风点火。他公然煽动画家“告状”。破口大骂共产党员“象特务一样”，“象木头一样”。

五、六月间，周扬的爪牙也四出活动。田汉提出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邵荃麟到浙江等地放火；夏衍在“几个比喻和联想”中攻击党的领导，说党的领导象鲁四老爷，自己并不是书法家，却硬把着已会写字的孩子的手去描红；石西民在上海大肆攻击党委审稿是“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文艺界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一时活跃非凡，八方呼应，梦想天下大乱，取而代之，复辟资本主义。

七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文章：《事情正起变化》、《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国人民更热烈、更积极、更坚决地投入反右斗争，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坚决反击，粉碎了右派进攻，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

七月至九月，反右派斗争一打响，吓得周扬一伙丧魂落魄。他们立刻见风转舵，摇身一变，把自己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整风开始时，周扬还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装扮成“左派”。这样，周扬这个大右派就漏过网去了。

反右以后，彭真把被罢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官的反党分子邓拓拉到自己手下，并提拔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同年，以周扬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召开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攻击鲁迅，美化叛徒周扬，为周扬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叫好。刘白羽早在延安时期就知道毛主席对“两个口号”争论的意见，但他一直坚持反革命立场，对抗毛主席。在会议上他有意地积极为周扬所执行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翻案，在这个阴谋中扮演了极其可耻的角色。

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央领导同志在成都会议上强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要不断革命。

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

同月，文艺界的一批头面人物林默涵、袁水拍、邵荃麟等，为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

论》文章发表举行座谈会，大捧周扬，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提出要以周扬的这篇文章作为“基础”，重新总结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他们就为伪造《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和篡改以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定下调子。

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鲁迅全集》第六卷出版，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亲自制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的注释，宣扬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正确，诬蔑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在以后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十卷中，又篡改历史，消灭证据，有意把鲁迅批判“国防文学”及其缔造者的一部分重要书信，不予编入。对三十年代文艺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完全颠倒的叙述。他们制作这条注释，扼杀鲁迅批评“国防文学”一批书信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打出“三十年”文艺黑线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同月，周恩来同志提出要迅速组织人员深入生活，反映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拍摄“艺术性纪录片”。林默涵、夏衍、陈荒煤等歪曲总理指示，把“艺术性纪录片”篡改为“纪录性艺术片”。

五月，党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毛主席在会上讲话，指出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六月，柯庆施同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高度赞扬了大跃进中产生的劳动人民的新民歌、小说、作品。

十月，陆定一对文化部党组提出批评。竟然污蔑一九五八年以后党领导的广大群众的文化革命，有“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并说这个时期重外轻中的倾向已“基本上扭转”，“要防止片面的排斥外来的东西”。

十一月，《前线》发表彭真亲自写的“发刊词”，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线的总纲领。它还以反“中庸主义”、反“乡愿”为名，恶毒地污蔑谩骂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株大毒草一出笼，杨献珍就立即把它印发给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还特别指示，这是彭真写的，责令大家认真学习。

五八年冬，周扬等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主讲《文艺问题讲座》，他诬蔑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完整性、系统性还不够”，对一些文艺理论问题“还没有解决，至少还没有完全解决”。狂妄地把车尔尼雪夫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说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得非常好，他的意见和毛主席说得差不多”。

同年，刘芝明指示新影厂反党分子丁山乔拍摄影片《横扫五气》，攻击三面红旗，极尽糟塌丑化我党干部之能事，是一株反动透顶的大毒草。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二十一大”。在会上赫鲁晓夫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国内，阶级敌人以为气候已到，蠢蠢欲动。

同月，中宣部叫文化部党组举行扩大会议，“检查一九五八年文化工作”。

夏衍批评五八年电影题材都是大题目，缺少“轻松愉快”的影片。

一、二月间，陆定一在教育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红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他大反“厚今薄古”的口号，说什么“古今都是‘钢板’，厚薄都有用”。

张庚发表《关于戏曲剧目》一文，鼓吹传统剧目“富于人民性”。

这个时期演出的戏曲剧目有《三侠五义》、《蝴蝶杯》、《武松与潘金莲》、《探母回令》、《十三

太保反苏州》、《搜孤救孤》、《啼笑姻缘》等。

二月，周揚在創作工作座談會上，瘋狂地攻擊大躍進，奴顏婢膝地把現代修正主義的反動藝術叫做“國際水平”。他咒罵我們的黨“有了一千萬噸鋼，就以為了不起了，連蘇聯也不放在眼裡了”。他把修正主義奉為“老子黨”，攻擊我們的黨“違背國際主義”。

周揚在《牡丹》二月號上發表文章，叫嚷經過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種被壓抑的情緒”，現在要顛倒過來，“要使人人敢於講話，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周揚所謂要“人人敢於講話”，就是要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爬起來，攻擊毛澤東思想，攻擊三面紅旗。

初春，周揚為了貫徹他鼓動牛鬼蛇神“敢於講話”的反動綱領，跑到上海，親自布置，面授機宜，要周信芳把封建統治階級的“清官”海瑞的事跡編一出戲。周揚還親自供應“武器”，給了周信芳兩本書：《海剛峰奇案》和《丘海二公合集》。并向周信芳說：現在“大家不敢講話，演一演這類戲是需要的”。他要通過《海瑞上疏》，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氣。《海瑞上疏》出籠後，周揚又親自“校閱”，並大加贊賞曰：“好戲，好戲！”

六月十六日反黨老手吳晗也跳了出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海瑞罵皇帝》，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鼓氣壯膽。

五月至十月，中國革命博物館建館期間，周揚多次前往放毒。他千方百計地阻撓陳列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著作，說：“不要凡是主席的東西都擺”，“《實踐論》、《矛盾論》一組的主席像可以取消”。竟指示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陳列序幕的主席像不要，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却“應該一個人有一個像”。極力詆毀毛主席。他不讓擺對遵義會議“評價的材料”。還別有用心地“要使每個根據地在博物館里都有個地位”，反對突出毛主席領導的中央根據地。

六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屆文藝會演大會在北京開幕，演出了《槐樹莊》等現代劇目。

而周揚在會演大會幹部座談會上號召部隊劇團去演《楊門女將》、《金沙灘》、《大雷雨》、《抓壯丁》等。

七月，文化部召開全國故事片廠廠長會議，夏衍在《提高藝術質量》的報告中，提出臭名昭著的“離經叛道”論，說：“各廠報來十二個題材，打槍的，放槍的就占了八個，是老一套的戰爭經，革命道，離開了這一經一道，就沒有東西”，“我今天的發言，就是離經叛道之言”。公然磨刀霍霍，向黨開刀！

八月二日——十六日黨中央在廬山舉行八屆八中全會。會上彭德懷反黨集團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夢想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全會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進攻。並要求各級黨委堅決為批判和克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

而劉少奇卻和彭德懷穿一條褲子，在會議期間給彭德懷打氣：“與其說你篡黨，還不如說我篡黨！”

九月至十月，周揚伙同周信芳精心泡制射向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一支毒箭——京劇《海瑞上疏》也在上海作為重點劇目演出，石西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鼓吹“周信芳的《海瑞上疏》是優秀劇目”，六四年還說：“《海瑞上疏》是周信芳解放後最成功的作品”，直到六五年十二月，他還說：“海瑞，過去都稱好，對皇帝敢罵”。

在電影方面，把《林家鋪子》、《聶耳》等毒草作為重點放映。

十二月，吳晗的大毒草《海瑞的故事》在中華書局出版，其中包括《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海瑞罵皇帝》，《海瑞的歷史地位》四株毒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〇年一月，舊中宣部召開了全國文化工作會議，公開壓制廣大

工農兵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反修鬥爭。會議期間，鄧小平親自出馬，發出一系列黑指示。他公然叫嚷說，對蘇修只要“一定時期”“批評一下”就可以了，“不要一下發動總攻”。甚至說：“批判文藝上的修正主義，辦法是批評我們自己”。

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文化部召開全國藝術教育工作會議。林默涵在會上作報告和總結。污蔑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文藝理論“不夠完整”，要編《藝術概論》。宣揚修正主義文學藝術，胡說蘇里科夫、列賓等資產階級藝術家“打不倒”。

四月二十二日，《紅旗》發表《列寧主義萬歲》。

在此前後，根據中央決定，為紀念列寧九十周年誕辰，出版《列寧選集》和列寧《論反對修正主義》等六本語錄。

四月十三日至二十九日，文化部在北京舉辦現代題材戲曲觀摩演出，齊燕銘提出“現代戲、傳統戲、新編歷史劇三者並舉”。

五月十五日，由周揚修定稿的社論《戲曲必須不斷革命》，強調“我們提倡現代劇目的時候，決不要忽視繼續整理傳統劇目工作”。繼續鼓吹題材多樣化。根本上否認了現代戲。

七月，全國文教群英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號召文藝工作者，“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繼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堅決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堅持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把文藝革命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三日，第三次全國文代會在北京舉行。周揚作《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的報告。打着反修旗號，輸運了不少修正主義私貨。他把《三家巷》、《紅日》、《搜書院》等一大批毒草捧為“優秀作品”，大加吹捧，要人們從十八、十九世紀歐洲文藝作品中吸取“經驗和智慧”。

文代會結束時，由周揚親自提名，把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提拔”為中國文聯“副主席”。其中的陽翰笙，是周揚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重要頭目，是舊影劇界“老頭子”之一，是文藝界“裴多菲俱樂部”的積極組織者。

七月二十九日，夏衍在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第二次委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大肆吹捧“三十年代”電影的進步性，認為早在三十年代，中國電影就解決了黨的領導和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問題。

八月四日，周揚在劇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講話，更加明目張膽地兜售修正主義黑貨。他還別有用心地曲解“歷史主義”的含義，說，“反對反歷史主義是反對把古代人寫成現代人”。為借古諷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出籠大開綠燈。

他還按着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的腔調誣蔑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現實，說什麼“一條被子的共產主義人家是不服的。”

宣揚修正主義戰爭恐怖論的毒草影片《楊門女將》出籠。

八月，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寶書《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了。毛主席著作，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指路明燈。

一切反動勢力最害怕毛澤東思想。陸定一、周揚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盤踞的“閻王殿”的惡煞們，對毛主席著作的出版發行，百般阻撓、抵制，一九六〇年原提出印一五〇〇萬冊毛主席著作第四卷，“閻王殿”卻砍去了40%；一九六一年，提出重印四卷本，“閻王殿”卻說：“已經印得很多了，是否還要再印？值得考慮”。“一般願意學的學生、工人、軍人、基層幹部、市民是否就非買一整套毛選不可呢？”“到底有多少人從頭到尾讀過呢？這是值得懷疑的。”結果，

宣判了重印計劃的死刑。一九六二年四月，又提出重印四卷本三十萬套的要求，“閻王殿”又扼殺。這一年國內一部毛著未印，是建國十六年來唯一空白一年。就在這一年，在周揚領導下，文化部卻把可印六萬部毛著紙張，用來重印一大批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古典文學。“閻王殿”還千方百計扣壓、禁止、阻撓《毛澤東著作選讀》、《毛主席語錄》等的出版。

九月，林彪同志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講話，指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個軍隊建設的方向。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我們更應該緊緊掌握這個方向。”

石西民對上海報刊宣傳工作“指示”時說：“宣傳毛選四卷，一不准借題發揮，二不准用概念分析代替歷史的分析，三不准庸俗化，不要什麼都說毛澤東思想，不要把毛主席沒有提過的也說成毛澤東思想。”

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明確的規定部隊文藝工作的任務是：“必須密切結合部隊的任務和思想情況，為滅資興無、鞏固和提高戰鬥力服務。”

## 一九六一年

一月 黨中央舉行八屆九中全會，全會的公報中指出：“現在修正主義者仍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危險。”“為了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堅決反對作為資產階級思潮反映的現代修正主義。”並又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極少數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總是企圖復辟，他們利用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困難和某些工作中的缺點，進行破壞活動。”

一月二日 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却以為復辟的早春氣候已到，廖沫沙在《北京晚報》發出進攻的信號：“腊鼓鳴，春草生”，“在春季就要開始大干。”

一月九日 吳晗破門而出，在《北京文藝》發表歌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立刻得到其黑幫弟兄們的捧場。

二月 周揚在審查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陳列時，猖狂反對陳列毛主席著作，說：“到處都是主席的東西，好像主席在給博物館寫標籤，主席的東西太多了反而減輕力量。突出紅綫不是一塊紅綫，紅綫是靈魂，不是肉體。要通盤檢查一下，不是毛選博物館，毛選那麼多文章都擺上還得了？”

二月二十五日 吳晗在《神仙會和百家爭鳴》一文中，大呼“一層層的神仙會，一直開到基層”，“因為基層的成員都在實際工作中，接觸實際、問題更具體，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在基層中“懷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動起來。

三月十日 《劇本》發表吳晗的又一株大毒草劇本《海瑞搗糴》。

三月十七日 周揚和夏衍在杭州對《魯迅傳》攝制人員講話。在對待魯迅的問題上，毛主席和劉少奇一向是對立的。毛主席號召我們學習魯迅敢於鬥爭的硬骨頭精神，而劉少奇卻叫人家學習魯迅“做黨的馴服工具”。周揚、夏衍等人一味稟承黑主子劉少奇的意旨，在拍攝《魯迅傳》中，竭力把魯迅丑化為“黨的高級馴服工具”，陳獨秀路綫，王明路綫的忠實走卒。更可惡的是，他們竟然違背歷史事實，砍殺了魯迅對毛主席無限敬仰等情節，把魯迅和毛主席、毛主席

的革命路綫隔絕開來。周揚反對影片中直接表現感謝毛主席，指責說：“把感謝毛主席這句話直接表現出來，一遍還不夠，感謝三遍、四遍。”“你感謝了那麼多，我就不感謝了。”夏衍借拍《魯迅傳》給陳獨秀翻案，說：“五四時代的人物，李大釗是馬克思主義先行者，陳獨秀也是”。

三月十九日 在一陣陣的密鑼緊鼓聲中，在一股股的黑風妖霧中，“三家村”反革命集團的《燕山夜話》開張了。這個反革命的黑營壘，向毛主席、黨中央射出無數毒箭。

四月 在文科教育會議上，陸定一大肆放毒，說：“現在還有新標籤，叫做‘毛澤東思想’，到處都貼。好像義和團一樣，念一個咒就刀槍不入，這是搞迷信。”

五月 徐光霄在一次會議上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他說，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庸俗化，什麼打乒乓球、賽跑、治癌症，都說成是毛澤東思想。

六月 吳晗在一篇名為紀念于謙的文章里，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比作于謙，大肆加以吹捧，說他“性格剛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他雖然“罷官”了，但最後“政敵都先後失敗”，他“名譽恢復”，被任命為“兵部尚書”，旁邊特地註明：國防部長。

鄧拓拋出《一個雞蛋的家當》一文，惡毒攻擊我們大躍進“失敗了”，“一個雞蛋的家當”“全都毀掉了”。

六月十六日 周揚在一次講話中，極力附和胡風的反革命言論，為胡風翻案。他說：“胡風說，機械論統治了中國文藝界二十年。……如果我們搞得不好，雙百方針不貫徹，都是一些紅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稱馬列主義，言必稱毛澤東思想，也是真夠叫人惱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記着胡風的這兩句話。”

六月至七月 文化部制定了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的電影工作綱領——“三十二條”。在此前後，修正主義毒草影片《劉三姐》、《五朵金花》、《花好月圓》、《生活的浪花》等風行一時。

六月三十日 田漢、陽翰笙在《戲劇報》吹捧“三十年代文藝”，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思想。隨即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了吹捧“三十年代”的《五四以來優秀電影劇本選》。

七月一日 以毛主席為首的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

八月 文化部黨組起草《劇院（團）工作條例》，提出一套“自由化”的修正主義主張。

《海瑞罷官》演出後，“三家村”的弟兄們揭竿而起，《劇本》第七、八期合刊上，田漢的《謝瑤環》、孟超的《李慧娘》，丁西林的《孟麗君》，三株大毒草同時出籠。

廖沫沙化名繁星，在《北京晚報》發表《有鬼無害論》，吹捧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鬼戲《李慧娘》。

九月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央關於全黨幹部輪訓的決定》，提倡所謂自由思想、自由討論，為資產階級思想大開綠燈，使那些對黨不滿分子公開地肆無忌憚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在這前後，劉少奇配合蘇修美帝和國內外反動派，猖狂攻擊三面紅旗。他胡說大躍進時期是“發瘋的時候”，是“無計劃的餓肚子”，“大躍進有些躍退了”，“人民公社……現在看不出優越性”。公開號召：“三面紅旗可以讓人懷疑幾年！”

十月 蘇共召開二十二大，進一步掀起了聳張一時的反華大合唱。

十月八日 鄧拓嗅到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的風雨，壓抑不住內心喜悅，在《事事關心》一文中寫了一付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招呼他的狐群狗黨听听“政治上的風雨”。

“三家村”弟兄們緊跟形勢，拋出《說浪》、《今年的春節》，吳晗心頭狂熱，大聲歡呼國內外反

动逆流的“这股浪头可真大”，今后将“越来越大”。

十月十日 邓拓在《伟大的空话》一文中咒骂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这一伟大英明的论断是“空话”，“入股”，“陈词滥调”，狂吠要我们的党：“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

## 一九六二年

一月 刘少奇在他主持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大肆攻击三面红旗，要把三面红旗当做历史教训来总结。

会上，刘少奇提出替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胡说“这几年重复了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提出：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不定罪等三条黑指示。并直接作了“只要本人提出申诉，领导和其他同志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翻案”的黑指示。黑司令一动员，牛鬼蛇神纷纷出来翻案，闹得乌烟瘴气。

三月 邓拓在《为李三才辩护》一文中，借明代李三才的“辞官”，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一班顽固腐败的势力”

同月 文化部和剧协在广州举行话剧、新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继续贯彻“文艺八条”的精神，大刮翻案风，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公开打击左派。

齐燕铭在会上狂妄地宣布受毛主席称赞的延安评剧院改编的《逼上梁山》有三条“罪状”：“群众是外加的”、“反历史主义”、“强迫集体创作”，因此，“应作典型批判”，说过去没有批判是“漏网的鱼”。他公然煽动作家起来同党“斗争”，说：“目前条件很好，我们要起来斗争”，“我们来时是阴天，回去后该是天晴了。”

阳翰笙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十条绳子”。

田汉在会上鼓动大家“出气”。

林默涵积极为《布谷鸟又叫了》等修正主义作品翻案，并且公开打击左派，攻击姚文元同志的批评文章“简单”、“粗暴”、“可怕”，还要上海的同志把他的意见带回去，对姚文元进行批评。

四月 中宣部主持起草的由《文艺十条》修改成的《文艺八条》，正式下达全国。它受到了部队、地方一些同志的抵制，却立刻得到一批牛鬼蛇神的捧场、赞扬，说它是“里程碑”。

五月四日 《人民日报》开辟《长短录》专栏，以后共发表文章三十七篇。其中黄似（夏衍）九篇，章白（吴晗）五篇，陈波（孟超）十三篇，万一羽（唐弢）二篇，文益谦（廖沫沙）七篇。这一丛毒草极力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

五月十七日 《红旗》杂志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发表题为《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的社论，强调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强调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指出：“不坚持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注意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五月二十七日 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人打着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旗号，抛出全民文学的破烂货色。

于此同时，许多刊物打着纪念《讲话》为名，刊登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如《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电影文学剧本《二月》（即《早春二月》）等等。

林默涵通过文化部安排“纪念”演出，毒草《抓壮丁》《四郎探母》被列为重点剧目登台。

石西民在上海指责上海评弹团：“你们为什么要禁演沈笑梅的《济公》《下江南》？”“让她说嘛，让听众去辨别。”

之后，《李慧娘》《谢瑶环》《火烧红莲寺》《费加罗的婚礼》《上海屋檐下》等坏戏、鬼戏在国内大泛滥，几乎完全霸占了戏曲舞台；电影《桃花扇》、《北国江南》、《红河激浪》等毒草影片开拍；宣传封建迷信的通俗书画在农村大量发行；……一个时期，把文艺界搞得乌烟瘴气。

六月 中央及时发现文艺界严重问题。林彪同志在《关于开展部队文化娱乐工作的指示》中指示：“部队的文化工作，也是一种宣传教育工作，同样可以起枪杆子的作用，而且还能起枪杆子所不能起的作用。”

七月 康生同志向夏衍转达江青同志的意见：最近一个时期，戏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坏戏，是个严重问题，文化部应抓一下。

江青同志看了京剧《海瑞罢官》，指出此剧有严重政治错误，停止该剧演出。

七月十二日 在一片“翻案”声中，文化部对过去已被停演的二十三部坏影片进行“甄别”，其中包括《布谷鸟又叫了》、《花好月圆》、《青春脚步》等，通知全国各地，重新放映。

七月十八日 《工人日报》开始连续刊登利用回忆录进行反党，为高岗翻案的《刘志丹》。周扬亲自接见写这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

七月二十五日 邓拓抛出《专治“健忘症”》刻毒地污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就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言而无信”，“喜怒无常”，恶狠狠地叫嚷要用“狗血淋头”，“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

八月 刘少奇的黑书《论修养》再版。《论修养》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典型代表作。此书出版在国内外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时刻，为刘少奇等人篡党，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八月二日至十六日 经过周扬、林默涵同意，邵荃麟主持召开大连创作会议。会上，许多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把农村描绘得一团漆黑。还提出了反对写英雄人物，提倡写“中间人物”和反党的“顶风人物”等修正主义谬论。

同月 故宫博物院公开展出“水陆画”（即“鬼画”）。

九月 党中央举行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九月二日 八届十中全会强大的战斗号角使牛鬼蛇神心惊胆战，丧魂落魄。“三家村”见势不妙，发表《三十六计》赶忙退兵，伺机东山再起。

十月 周扬匆忙做检讨，把自己打扮成“不能说精神准备很充分”的左派，同时歪曲十中全会的精神，说文艺界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东西发表得不多。”

十一月 在周扬的亲自策划下，在山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对十中全会的一次疯狂反扑。

齐燕铭在北京京剧创作座谈会上说，前一个时期上演鬼戏、坏戏是个别现象，“并不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产生这些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剧目贫乏”。他又说，鬼戏是“旧剧本里原来有的，如《铡判官》、《游西湖》，没有办法，一些不好说的话让鬼来说，同时那时又是有鬼论。”

冬 江青同志接见北京京剧一团的青年演员，鼓励他们演现代戏。江青的话得到他们的热



烈拥护，以后京剧一团成为现代戏的实验田。

十二月 在江青批评剧目混乱，提出禁演鬼戏以后，徐平羽还向全国推荐《海瑞上疏》、《海瑞背纤》、《武则天》、《探阴山》、《香罗帕》、《秦香莲》等所谓“好戏。”

同年 阳翰笙四出奔走，大开黑会，大刮黑风。他攻击社会主义没有“民主”，逼得人“妻离子散”。他咒骂党的领导是“小霸王”，诬蔑党的文艺批评是“瞎指挥”。他到处煽风点火，气势汹汹地要同党弄清“是非”，要党承认“错误”。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

同年 吹捧刘少奇的影片，大毒草《燎原》摄成。

## 一九六三年

一月 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十中全会的精神提出写十三年（即大写社会主义）。要求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

同月 石西民在一次报告中说：戏曲“要把整旧工作放在第一位”，“京昆以整旧为主”；说《打金枝》“很好”，“除了有害的剧目都可以演”。他到上海京剧院说《贵妃醉酒》是“好戏”，《宏碧缘》没问题，可以演，把它当为“无害”连台本戏的样板。他还让《七侠五义》、《孟丽君》演出。

二月 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来北京汇报演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周总理观看后，说“主席讲，现实东西少了。现在就要搞些反映现实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思想阵地还不巩固，擂台要天天打。”

林默涵大肆反对写十三年，认为提倡写十三年，就把题材弄狭窄了。

阳翰笙写的大毒草《李秀成之死》改名为《李秀成》，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它遭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坚决抵制。

上半年 毛主席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严厉提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主席极其关注文艺界状况。

三月八日 刘少奇公然攻击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评，斥责说：“问题是禁止演戏的人多了，瓜没有熟，要去摘，主观主义，自以为是！”他竭力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争夺舞台：“可表现现代生活的，就演现代生活的戏，不能表现现代生活的，就演历史戏。”“唱词不必去改，那个时代的话反映那个时代的思想。现在观众有判断能力的。”

同月 黑司令一声令下，喽罗们蜂涌而上。田汉在高级党校作报告公开反对毛主席。他说，大家知道，神也好，鬼也好，戏剧上都是允许的，这并不是相信神、鬼，共产党员都是无神论者，谁也不相信神鬼，这代表一种反抗精神。象《李慧娘》就代表了人民的愿望，死了还要报仇。

徐平羽根本不理睬毛主席对鬼戏的批评，竟让中国京剧院四团大演《包公下阴曹》的鬼戏，当有人提出批评时，徐不以为然的说：“你提这样的意见，还有人（指江青同志）提出禁止鬼戏呢！”

邵荃麟按照林默涵的授意，以作协党组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所谓《关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文学创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捏造大量所谓巨大成绩，掩盖文艺领域中毒草泛滥严重情况。

春 阳翰笙、刘芝明（文联黑党组正副书记）以“为党组织队伍”为名，行组织反革命复辟班底之实。刘芝明特地给阎王殿打了一个黑报告，提倡用“社会方式”搞文艺上的统战工作，即要

文联敞开大门，把牛鬼蛇神请来吃吃喝喝，玩玩谈谈。早在刘芝明打报告之前，阳翰笙就大办“文艺俱乐部”，网罗国民党特务、反动政客、三青团头子、洋奴、汉奸、右派分子、流氓、反动学术“权威”。组织“川帮”，大搞复辟阴谋。后在刘芝明积极配合下，把文联办成了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

这几年，阳翰笙、刘芝明在周扬支持下，在西山等处大办“读书会”，他们借学习为名，实际上为右派分子开辟道路。阳翰笙、刘芝明把一些大右派分子，如陈学昭、王希坚等人请来，大吃大喝，还请杨献珍、孙定国等人大作报告，并把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提纲取来发给这些所谓学员。与此同时组织这些人看苏修电影，大写反动诗画。“读书会”实际上就是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场所。

四月 周总理在文艺工作会议、文化局长会议、出版工作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明确指出：文艺创作应以“歌颂今人的作品为主”，而“十三年中，重点又要放在社会主义革命。”

在江青同志的一再催促下，中宣部、文化部发下了《关于停演鬼戏的通知》。

五月 江青同志组织文章，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汇报》上发表。

六月 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讲话，指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流血的阶级斗争，有不流血的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

六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猛烈地抨击国际修正主义逆流，给世界革命人民指出斗争的道路。

八月 毛主席观看话剧《雷锋》（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抗敌话剧团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

戚本禹同志在《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启超、吕集文等先生商榷》，提出《李秀成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不应把他当英雄歌颂。

中宣部竟发出通知，说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有危害的，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并组织邓拓、翦伯赞之流写文章围攻戚本禹同志。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发现和制止了。

九月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示，戏曲要推陈出新，要出社会主义之新，不应推陈出新，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姚文元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略论时代精神问题》，批判周谷城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等文中散布的反动的“合二为一”“时代精神汇合论”等谬论。

十一月 毛主席对组织文艺工作者下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部。

毛主席观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

同月 刘少奇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当前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仅仅是反对外国的修正主义，这样就可以防止国内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了。竭力掩饰文艺界问题的严重性，继续纵容毒草滋长泛滥。

冬 周扬拚命抵制柯庆施同志亲自所抓的大演革命现代戏，鼓吹历史、传统剧目是“无害的”，甚至狂吠：“我们的祖宗，不都是乌龟王八蛋！”

阳翰笙的又一个“大毒草”《三人行》由实验话剧院演出。

十二月 毛主席在一份反映柯庆施同志大抓故事会和評彈改革的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詩和文学等等，問題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还是‘死人’統治着。許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主席的話一針見血地击中刘邓黑司令部和它把持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要害！

同月，华东区話剧观摩演出开幕，柯庆施同志在会上提出一定要大力提倡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剧目。

## 一九六四年

一月三日 刘少奇、邓小平急急忙忙以中央名义召开文艺座談会，借口貫徹毛主席的批示，实际阴謀抵制。

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授意下，周揚在会上作了一个与毛主席的批示大唱反調的发言。他千方百計地宣揚文艺界的“新气象”，美化刘、邓黑司令部；把他們阴謀复辟資本主义的种种罪行說成是什么工作上“有时候抓不紧”，对社会主义的新东西“扶植、肯定不够”；他閉口不談批判毒草，却大嚷“中心問題是創作問題”，用“立”来对抗“破”。

刘少奇对周揚的发言贊賞备至。他赤膊上陣，自己跳出来为牛鬼蛇神辯护，說：“絕大部分是認識問題，也有些人是二心的、反党的、要进行批評，但不要象反右派那样。”

邓小平抛出精心炮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工作計劃。这是十分恶毒的一个全面地、有計劃地对抗毛主席“批示”的黑綱領。邓小平把这个計劃概括成十二个字：“統一認識，拟定规划，組織队伍。”其实质，就是要把文艺界都統一到刘、邓黑司令部中去；就是要拟定一个为复辟資本主义制造輿論的长远规划；就是要招降納叛，組織刘家的反革命死党。

春 陈荒煤竟然在影协明目張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批評，頑固叫嚷：一九六一年的电影創作會議是正确的，不是方向不明，要承认資本主义文艺高峰，是历史的遗产，曾起过进步作用。

徐平羽在舞蹈会演准备會議上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說：“沒有恋爱題材，中国人不要恋爱是不对的，但舞蹈要表现高尚的爱情。都是花鳥魚虫不行，但都是阶级斗争也不行。”

三月 徐平羽公然与江青同志领导的芭蕾舞剧革命相对抗，他說：“不要因为演了《紅色娘子軍》，《天鵝湖》等就不演了，这会带来很大損失。”“已有的剧目你們千万不要丢掉，要练功，还是要演《天鵝湖》，《巴黎圣母院》。”

四月 解放軍第三屆文艺会演大会在北京举行。

四月九日 正当在进行戏曲革命时刘少奇声嘶力竭地替古戏叫好，他說：“中国資本主义的，我們叫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音乐、小說、詩歌、戏剧，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現在写的小說、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五月，林彪同志听取了关于全軍第三屆文艺会演情况汇报后，对部队文艺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強調指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的斗争；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資的斗争。”指出“我們的艺术作品，在內容上必須革命化，战斗化，必須以毛澤东思想为方針，反映现实生活，为工农兵服务，这是坚定不移的方向。”提出要抓好“三結合”，“三过硬”，“四边”，“四比”。

同月 彭真搞京剧《箭杆河边》，与江青同志抓的京剧《紅灯記》，《沙家浜》唱对台戏。当有

人轉达江青同志对《箭杆河边》的批評“反面力量太猖狂了，正不压邪”时，彭真恶狠狠地攻击江青同志說：“不要怕反面把你压倒！”

六月 冲破刘邓黑司令部的种种刁难，重重阻碍，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下的京剧現代戏在北京演出成功，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贊揚。毛主席看了《紅灯記》、《芦蕩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团》等优秀剧目的演出，并接見全体人員。这是对現代戏剧革命最大的鼓舞！

六月二十三日，周总理在和各演出团、观摩团的負責人，主要演員的座談中，肯定了一九五八年演革命現代戏的方向，批評了“文艺八条”以及文艺界对抗毛主席的文艺方針。号召大家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在戏剧界掀起一个革命。”

江青同志在座談会上，发表重要講話，她說：“对京剧演革命現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創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的真正主人翁，那是不能設想的事。我們要創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她提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不能再占据戏剧舞台，戏剧必需为工农兵服务，而不能为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

康生同志也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这次观摩演出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这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个組成部分。

正当全国大演京剧現代戏时，邓小平跳了出来，他在中央書記处書記會議上攻击江青同志：“有些人就是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着別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个小辮子就批判半天，好自己出名。”他污蔑戏剧改革：“运动搞得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那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

彭真在現代戏剧观摩演出期間多次造謠，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革命現代戏还处在“穿开襠褲”和吃手指头阶段，存在“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甚至三个指头”的缺点。此后，他还让李琪搞了一百出京剧历史剧目准备演出，他指使邓拓在北京实验京剧团大力提倡古戏。

六月二十七日，针对刘邓黑司令部种种恶劣的抵制，毛主席对文艺部門作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指示：这些协会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說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緣，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的話象照妖鏡，把刘邓黑司令部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綫照得原形毕露。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仍負隅頑抗，反对毛主席的批示，他們通过陆定一、周揚、刘白羽等人，搞假整风假批判，捏造事实，謊报成績，制造文艺界的所謂“繁荣景象”。

七月二日，周揚召集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負責人开会，布置所謂“整风”，在会上周揚定下保黑司令部的框框：“政治上搞修的，至少领导集团还没有发现。”文化工作中的問題，“中宣部、文化部、各协会均是認識迟，有責任。”他一再示意文化部党羽作假檢討：“我們是要扶你們的，你們不主动，中宣部作靠山也靠不住。”

七月十一日，文化部开始假整风。由齐燕銘、徐光霽、陈荒煤、李琦等四人組成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他們导演了真包庇假批判阳翰笙借以达到保护周揚，刘芝明的丑剧，假整风只让党员干部和少数群众参加，严加保密。整风后阳翰笙一根毫毛未动，仍然担任文联付主席。刘白羽在作家协会任假整风组长，抛出邵荃麟搞假批判，玩弄丢車保帅的阴謀。

同月 周揚在京剧現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講話，公然同主席批示抵抗，竭力为反党分子孟

超、田汉的罪行开脱，說“《李慧娘》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情緒，不是說孟超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还是个共产党员”。又說田汉的《謝瑶环》只是“流露对现实的不满”，“不是說《謝瑶环》整个的都反动。”这真是奴才保主子，主子保奴才。

七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共发表了九評苏共中央給苏共党员的公开信。击败苏修对我的猖狂进攻，不久赫魯曉夫被赶下台。

八月 毛主席在“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上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

九月 毛主席在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写的一封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指示：音乐学院的問題应该解决，应在师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

林默涵阳奉阴違，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包庇赵讽，沒有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中展开充分討論。音乐学院的問題不了了之。

同月 大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紅色娘子軍》上演！九月二十一日，中宣部派所謂“調查組”到文化部控制局勢。接着齐燕銘仿记录人笔迹私自篡改广州會議档案，夏衍修改发言紀要，推卸責任，徐光霄对說过的話不认賬，徐平羽擅自删改簡报材料，追究发言人，压制批評。群众对調查組强烈不满，有的同志准备到中南海去告状。

十月 中宣部工作组进入文化部，周揚亲自出馬压住陣脚，他在会上定下框框：这次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弄清思想”。工作组作了几項規定 不貼大字报，不开大会，对中宣部的意見不登簡报等。“整风”结束后，有关中宣部的材料，全由工作组收走、燒毀。

齐燕銘、夏衍、陈荒煤、徐光霄、徐平羽再次檢查，群众仍不予通过。但周揚以“不要揪住不放”为名，保护他們过关。

十一月 文联各协会的假整风，在周揚把批判对象和干部抽出“搞四清”情况下，完全中断，这是一个大阴谋。阳翰笙被保护过关，刘芝明及一些协会领导人的問題沒有被揭发。

十二月 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上，強調指出：必須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同志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一次會議上向陆定一、周揚、林默涵、姚溱等人提出，一大批坏影片都应当批判；批判了，可以达到思想、經濟双丰收。陆、周、林、姚等人秉承彭真的旨意，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原訂批判十部坏影片的計劃否定了，只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鋪子》两部。

## 一九六五年

一月 江青同志在上海市委关于几部影片上映問題的請示报告上批示，不要为坏影片遮丑，坏影片上映前不要修改。周揚違背江青同志的意見，說他已同彭真、罗瑞卿商量过，都同意对坏影片作些修改再上映，周揚并直接把他們的錯誤意見告上海。結果，《不夜城》、《舞台姐妹》、《阿詩瑪》等毒草上映前都作了修改、美化。

二月 周揚、林默涵召开报刊文艺評論會議，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大反文艺批評的“简单化”，提出糾“左”的問題。包庇陈翔鶴的反党历史小說《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不准談小說影射现实的問題。林默涵蔑視工农兵参加文艺批判、斥責《文艺报》的同志：“你們說工农兵評論有偉大意义，难道比原子彈爆炸还偉大？”

三月 由罗瑞卿提名，經刘少奇、邓小平批准，刘、邓黑司令部的得力干将肖望东，調到文化

部任副部长。肖望东念念不忘主子对他的賞識和栽培，奔走于彭真、刘志坚、陆定一之間，領取黑指示。

三月三日 在刘邓黑司令部主持下，泡制了一个會議紀要，在这个紀要里，邓小平攻击六四年以来学术文艺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革命，是搞“过火”了，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要求赶紧“刹車”，規定重重“王法”：今后对全国著名人物点名批判，必須报中央批准。他們这个刹車通令，果然收到了效果。在这以后，报刊上的批判大部停下来了，对于田汉、夏衍，这些早已决定公开批判的人物，連假批判也不搞了。接着，党内外刮起了一股对一九六四年批判运动的翻案风，攻击批判是“爆破組”、“文海战术”、“以空論对空論”……。这股黑风一直刮到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发表以前。

五月 所謂文化部新党委成立。党委成員包括有肖望东、石西民、林默涵、刘白羽、赵辛初、顏金生、徐光霄、徐平羽、李琦等。肖望东任书记，石西民任副书记，黑閻王陆定一是太上书记。

肖望东、十分欣赏和吹捧周巍峙、李伯釗（楊尚昆老婆）等右派分子。准备把周巍峙提拔为副部长，把李伯釗提升为院长，并已上报陆定一。

七月 以肖望东为首的“新党委”向彭真汇报并請示工作任务。从此以后，所謂新文化部的工作完全納入黑司令的反党黑綫軌道之內。

江青同志在二月間对电影体制作了重要指示，并要文化部认真解剖一个麻雀，肖望东却把它扣压到七月才批交电影局“研究”；在調查过程中，赵辛初明目張胆地篡改和歪曲江青同志指示，并置若罔聞不了了之。

九月 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吳晗的問題，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問題。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會議上，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迴避問題的实质，只回答說，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

九月二十三日 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會議上，彭真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反对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綫，把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尖銳的阶级斗争說成是思想認識問題，大肆宣揚“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修正主义謬論，还用“錯誤言論，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陆定一在会上大反斯大林。借反对个人迷信，恶毒攻击毛主席。周揚吹嘘所謂整风的成績。

十月 江青同志亲自指导的交响乐团改革成果《交响乐《沙家浜》》开始演出。肖望东等人却置若罔聞。他胡說演革命现代戏，好似抹烟鼻子一样，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喜欢。

江青同志对电影摄影工作會議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肖望东、赵辛初、刘白羽根本未做傳達，更未加实施。

十一月 秉承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旨意，陆定一周揚、肖望东等人召开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創作积极分子大会，一方面出版青年作者文学丛刊，一方面在报刊上大肆进行宣傳，制造文艺界的“繁荣景象”。从根本上否定了毛主席对文艺界的尖銳批評。

十一月十日 在毛主席号召之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評新編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十一月十一日——二十八日 彭真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視姚文为洪水猛兽，怕的要死，恨的要命。下令禁止北京各报刊轉載姚文。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等才被迫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討論北京

報紙轉載姚文元文章的問題。彭真問鄧拓，“吳晗現在怎樣？”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大聲說：“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狂妄露骨地反對毛主席。

在此前後，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竟任命彭真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組織了康生同志、陸定一、吳冷西、周揚為五人小組成員，排擠康生同志，有計劃、有組織地保護《三家村》過關。

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二日 《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陸續轉載姚文。《人民日報》將姚文放在《學術研究》欄。編者按語按照彭真的意見，只把這個問題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且強調“既允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按語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鬥爭，這是周總理加的。

十二月八日 《紅旗》發表戚本禹同志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批判翦伯贊、吳晗為代表的反動歷史觀。

十二月十二日 《前綫》、《北京日報》突然以顯著地位，醒目標題發表題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企圖用“小罵大幫助”的手段，把對吳晗的批判，從尖銳的政治問題拉到“純學術”的問題上去。著者向陽生，就是反黨老手鄧拓。這篇文章是在彭真親自指導下寫的，最後由彭真親自修改，定稿。

周揚、林默涵等人不甘落後，指使文藝界拋出學術討論文章。林默涵在一次文化部會議上把吳晗的問題說成是“歷史觀點”，“道德觀點”的錯誤，說：“海瑞罷官”是兩個方面的集中表現。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找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同志講話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击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个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了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找彭真、康生、楊成武等人談話，又講了前一天同陳伯達等同志的意見。提出要害問題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立即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聯繫，掩蓋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要求單獨同毛主席談話。談話後彭真故意造謠，說毛主席贊成他們的所謂“放”的方針，還造謠說，吳晗問題要兩個月以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以後再談政治問題。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報》發表了吳晗在彭真授意下寫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這是一篇假檢討，真進攻的文章。然而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的要害問題。

吳晗的假檢討發表以後，鄧小平對萬里說：“吳晗就那麼多問題，批判批判，就可以了。”公然包庇吳晗。

冬，肖望東、趙辛初根據彭真的黑指示，製造假相，拍攝了《北京農業大躍進》紀錄片，對抗毛主席樹立的紅旗大寨，欺騙人民，為舊北京市委樹碑立傳，歌功頌德。

一月 肖望東違抗康生同志的指示，經劉少奇同意，在彭真的具體指示下，制定了“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若干問題向黨中央匯報提綱”，由肖望東直接向彭真的五人小組“匯報通過”，做為中央文件批轉全國。這個提綱抹殺階級鬥爭，否定文化革命，貫穿彭真“先立後破”的謬論，實際是周揚反動“文藝八條”的變種。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關鋒和戚本禹的兩篇批判吳晗《海瑞罷官》要害問題的文章寫成。這兩篇文章都送給了中宣部，一直被他們扣壓着。

二月二日 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託，就部隊文藝工作的若干問題，在上海開始進行座談。

二月三日 彭真召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在会上發了七個攻擊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彭真要对左派進行整風，不要當“學閥”。他還說，已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他還要爪牙劉仁、鄭天翔證明，鄧拓是擁護三面紅旗的，長期以來是堅定的。康生同志在会上與彭真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指出，同吳晗的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要分清階級界限；要保護關鋒等左派同志，要依靠他們組織我們的學術批判隊伍，要把鬥爭的鋒芒對準吳晗，要揭露吳晗的政治問題，要害問題，要聯繫廬山會議的階級背景來談。康生同志批評許立群不收集吳晗的材料，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

會後，彭真要許立群和姚溱起草“匯報提綱”。

二月初 在彭真的具體指揮下，由閻王殿的許立群、姚溱泡制了一個徹頭徹尾反毛澤東思想的所謂“五人小組匯報提綱”，陰謀打擊左派，扼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劉少奇是這個大陰謀的總根子。這個“二月提綱”在泡制過程中是在劉少奇家裡討論通過的，後來又是在他的直接支持下，盜用中央名義，發到全黨，流毒全國。

在這期間，劉少奇竭力庇護自己爪牙，妄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納入純學術批判的軌道。他說：“寫文章要慎重，要有水平，要寫出高明的東西，這是打筆墨官司，不要辱罵。”

二月八日 彭真向毛主席匯報。在匯報過程中，毛主席的意見同彭真完全對立的。毛主席當面問了彭真兩次，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彭真事後故意歪曲，說毛主席認為吳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否定解放以後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各次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他認為，這些批判都是虎頭蛇尾，沒有結論，他說這次要做政治結論。毛主席明確地反對和批駁了這種意見，指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絕不是匆促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完結的。當彭真說到，要用“整風”的方法整左派的時候，毛主席立刻加以駁斥，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當許立群攻擊關鋒的雜文時，毛主席明確地頂了回去說，寫點雜文有什麼關係，何明（即關鋒）的文章我早就看過，還不錯。

二月十三日 彭真指定胡繩和張春橋談話。胡繩說，不能講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聯繫廬山會議，並且硬說是毛主席的意見。企圖以此壓抑上海革命的同志。

二月底 中國人民大學去告陸定一的狀，劉少奇還批示說：“陸定一是一個很好的同志。”

在劉少奇的庇護下，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策劃兵變。但是他們的這個陰謀，早被我們英明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及其親密戰友林彪同志識破，未能得逞。

三月 陸定一在南方和彭真南呼北應，合謀製造大混戰，他到江西、安徽要大搞學術批判，愈多愈好。

三月十七日——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青年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等同志文章，题为《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三月二十八——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四月二日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及其爪牙扣压了两个半月之久。

春，文化部讨论确定文艺界的所谓标兵，没有一个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代表三年来社会主义文艺样板。

以刘少奇出国访问为题材拍摄的影片共八部。五部是在周扬、夏衍、陈荒煤等窃据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岗位时期摄制的，三部是在肖望东统治文化部时期摄制的。这三部影片是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出国访问印度尼西亚等，是经过刘少奇、邓小平、肖望东先后审查通过的。影片通过后，印制了大量拷贝，作为重点节目，在国内普遍上映，流毒极广。

四月五日 彭真召集十几个人开会，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谁就是谁。又说，吴晗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及其爪牙扣压两个半月之久。

四月七日 彭真将《纪要》的草稿送交肖望东。林默涵立刻偷抄下来，在专业创作会议上作报告，全面地剽窃了《纪要》的内容，并作了严重歪曲，为所谓的三十年代文艺路线辩护。

毛主席关于一批坏电影必须批判的指示已经下达一年八个月之久了，在江青同志一再督促下，林默涵不得不匆忙搞出批判七部电影的报告，但对《抓壮丁》、《红日》这样的大毒草却不列入。肖望东等人，对批判毒草电影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表示：“文艺评论是不是我们来抓？”对此按兵不动不加过问。

四月九日——十二日 在书记处会议上，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最后周总理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次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江青同志的《座谈纪要》。这个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真连续召集旧北京市委常委开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错误。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编者按。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具体规定的，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消。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指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

五月四日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问题。“四家店”彻底破产。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光明日报》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五月十日 《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

五月十一日 发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

全国掀起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反党反社会主义滔天罪行的群众运动。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月二十五日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刘少奇、邓小平指使李雪峰立即到北大去大讲“内外有

別“要有黨紀國法”。對支持這張大字報的康生同志施加壓力，向毛主席嚴密封鎖消息，企圖將這張革命的大字報扼殺於搖籃之中。

六月一日 毛主席知道情況後，打電話給康生同志，立即廣播刊登聶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國燃燒起來了。

六月初 文化革命的风暴，猛烈冲击着刘邓黑司令部。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局面，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际，违抗毛主席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急如星火地一连几道圣旨，调兵遣将，派出大批工作组，充当“消防队”。

刘少奇一手策划制定所谓“中央八条”，把“内外有别”“注意泄密”“坚守岗位”等八条枷锁套在革命群众脖子上。

刘少奇指示：“要斗也可以，但要有材料，要有布置。”“要采取第二号人物起义。”企图庇护和收罗漏网的喽罗。

六月十八日 北京大学革命师生自觉起来斗黑帮，大快人心，而工作队张承先却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制造白色恐怖。刘少奇、邓小平立即命令总结“经验”刊登，向全国推广，并加了所谓“中央指示”，说什么“别处发生类似情况也照此办理。”

六月十九日 刘少奇派王光美去清华活动，以后王光美正式插手清华运动，把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清华八百多名师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

六月 中宣部，文化部把一些黑帮分子集中起来搞“训练学习”，进行所谓的互相揭发批判。因此文艺界出现群情激愤，要斗争黑帮，却找不到黑帮的稀奇古怪现象。当革命群众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默涵从“集训班”揪回中宣部斗争时，林默涵还夹了大皮包，轻松地走进会场。一进门，才发现气氛不对，赶快回头把皮包放到小汽车里去。

十月三日 《红旗》杂志发表“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等文章。把文艺界牛鬼蛇神的祖师爷，罪恶累累的黑帮头子周扬揪了出来。

刘少奇急如星火地派人打电话安慰周扬，要他在地好好“养病”。并专门派人去周扬那里“抚慰”，说什么：“不要紧张”“先养病”等等。中宣部革命群众要斗争周扬，但在刘少奇庇护之下，一直迟迟揪不回来。

七月上旬 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派工作队到外地搞文化大革命，陶铸坚决执行，立即抽调干部，组织三个工作队，准备到中南、西南、华东等地去镇压革命。

七月十四日 陶铸宣布所谓“新中宣部”成立，张平化、雍文涛和旧中宣部的张际春为副部长，将张子意和张盘石另行调动分配工作，包庇过关。会上还将文化教育部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推行修正主义的肖望东、何伟、钱信忠、荣高棠、丁莱夫等代表人物拉上主席台，并加封他们的官。

七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他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并派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北大进行调查。

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中央文革连续在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揭发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执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毛主席支持下，赶走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

陈伯达根据毛主席指示，号召搬掉绊脚石，自己闹革命。

八月一日——十二日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于北京召开。它宣告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刘少奇、邓小平彻底暴露了。

八月二日 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跳了出来，死保刘少奇、邓小平，说什么刘、邓“确实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平同志算是老革命了，我是中革命，不算老，也是碰到问题了。”

八月五日 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尖锐、彻底地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丑恶嘴脸。全国人民追根究源奋起向刘邓黑司令部猛烈开火。

八月十八日 毛主席首次接见来京百万红卫兵小将。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红卫兵走向街头，以极强烈的革命造反精神，大破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修正主义四旧，其势如暴风骤雨，洗滌几千年以来的污泥浊垢。一切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八月以后 肖望东、赵辛初在陶铸的支持下，在摄制毛主席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的几部影片中，疯狂对抗中央文革对影片拍摄工作的指示，使用各种卑鄙手段，竭力突出刘邓。

十月一日 林彪同志在国庆典礼上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

一个群众性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掀起。刘少奇的爪牙：薄一波，李井泉，刘澜涛，相继被揪出。

十月初 陶铸指使熊复，由新华社伪造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宋庆龄在天安门上的合影；另一张是将康生身边的陈毅的头部换上邓小平的脑袋。力图借毛主席的伟大大光辉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刘少奇、邓小平镀金。

十月十九日 伟大的革命先驱鲁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但是陶铸却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瞒着中央文革小组，泡制了这样一个计划：召开只有150人的座谈会（连个纪念会的名称也没有），冷冷清清，不象样子。企图以此缩小毛主席重新肯定鲁迅的重大政治意义，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幸亏中央文革小组及时发现了这个阴谋，中止了这个“座谈会”。

十月三十日 首都革命群众隆重举行七万余人的纪念文化战线伟大旗手鲁迅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陈毅等同志出席了大会，陈伯达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讲话，号召我们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革命战斗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友鲁迅精神永垂不朽！

十二月十七日 自11月以来社会上刮起一股黑风，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这股黑风来自刘邓黑司令部。

周总理、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召开全国在京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坚决击退这股黑风。

十二月下旬 文艺界战士响应江青同志的战斗号召，将周扬揪回斗争。反党分子阳翰笙、田汉也遭到彻底批判、斗争。

一九六七年

一月初 全国人民集中炮火，向刘邓黑司令部发动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得力干将陶铸、贺龙被揪出来。

一月九日 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组织发出《紧急通告》。提出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个《通告》得到毛主席的有力支持。

一月中旬 文化部革命派联合起来，夺了旧文化部的权，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赵辛初、李琦、刘白羽等人展开大揭，大批，大斗。

二月 中南海的革命造反战士狠斗了罪恶极大的刘少奇和他的臭婆娘王光美。刘少奇狼狽不堪，丑态百出。

无数的革命的文工团小分队出现在全国各城市的街头，出现在工厂和农村，他们以战斗的热情的生动的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造革命声势，大长革命派威风，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被刘少奇扼杀和压抑了十多年的革命的文工团，在毛泽东思想的滋润下，象雨后春笋一般的涌现出来了！

四月一日 戚本禹同志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它的发表，宣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的死刑，宣判了刘、邓黑司令部的彻底完蛋！

四月二十日 具有人类历史伟大意义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新的伟大胜利，并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本文选编时略有删节)

## 最高指示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

1949—1952年

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表现在，是采用改良主义方法进行旧教改，而实际上是继承欧美的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还是发扬老解放区传统，有步骤地把旧大学改造成为抗大式的新型大学。

1948.12.14 刘少奇对马列主义学院第一班学员讲：“有人認為，何必学习这些外国的东

西？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者至少先读中国书，再读外国书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借口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抵制、反对学习毛著。刘少奇还要学员们“好好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

1949—1950 全国接收近200所高等学校，约占全部高校85%。而15%为老解放区的新型的抗大式的学校，但它代表着无产阶级教育的方向。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针：一种方针是继承欧美资产阶级教育一套，另一种是发扬老解放区光荣传统，把旧大学改造成抗大式的新型大学。

1949.12 维护旧教育制度的代表钱俊瑞（前普、高教部书记）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公然说：“老解放区的经验是长期农村环境与战争环境中的产物”，而“今后的主要任务将由战争转入全面的建设”千方百计地否定老解放区的新大学，而鼓吹要办“近代化”的大学。

1950 毛主席指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

1950.6 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新区旧大学和老区新大学，两种类型学校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斗争。（高校性质，任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课程改革与实施方法等重大原则问题都有争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会议决定：在全国实行旧教改，从改革教育内容着手，并进行改革课程，改编教材，改进教学方法，改变教学组织等。当明确规定：“培养具有高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

（按）这种旧教改完全是改良主义，根本没有触动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不但旧大学没有改革，相反连老解放区的新型大学却被改造成所谓的“正规化”的学校。原来政治课以毛著为基本教材也被改为学习系统的理论知识；原来著名的华北大学被改成了“正规化”的中国人民大学。

1950.6.19 毛主席作了“健康第一”的指示。并指示：“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

1951.3 刘少奇对教育部指示“学校中必须强调教学，行政工作为教学服务，校长负责制改为校长责任制，要肯定向这方面做。……政治课内容要讲比较完全的政治知识。教材要以苏联课本为基础。”再次反对政治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1951.5.20 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

1951.11.15 毛主席再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

1952—1957年

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表现在：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还是全盘照搬苏修的一套，走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这段时间里，旧欧美与苏修的教育制度摧残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与毛主席的三好指示是针锋相对的，这实际上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 1952-1953 全国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教师中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给欧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以有力的打击，旧大学的改造势在必行。摆在当时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另一条是照搬苏修的一套，走修正主义的道路。(1953)
- 1952.7.29 刘少奇给留苏学员的讲话说：“到那里去，要按纪律办事，好好学习，祝你们都以5分毕业回来，让步一点，是二分三分就不太好了，两分的话，自己就捆被包回来……。”鼓吹分数挂帅。
- 1952 开始进行全国院系调整。
- 1952下半年 魏俊瑞和楊秀峰在刘少奇的“搬过来再说”的荒謬主张支持下，大张旗鼓地全盘把苏修的一套搬过来。统统采用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等，甚至连评分法也改为“五分制”。而苏修的这一套完全是凯洛夫一套，抹杀阶级斗争，宣扬技术至上，理论至上，专家教授治校。
- 反对毛主席历来关于学习外国的教导：“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该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鑑，盲目搬用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 1953 楊献珍等一伙秉承刘少奇的指示，提出了“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十六字”方针，并得到刘少奇的批准。这个方针明目张胆对抗“七大”的“全党干部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党校必须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规定。（后来中央曾多次批评“十六字”方针。）
- 1953.5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作了增进学生健康的指示。
- 1953.6.30 毛主席号召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 1954 刘少奇对高级党校工作的指示，“要正规化。要使人们树立起教学理论工作的事业思想，实行这套制度（指在高级党校实行苏修一套学衡制度）是必要的”刘少奇亲自出马，大力鼓吹全盘学苏联。
- 1954—1955 高教部颁发的《1954—1955学年工作计划指导要点》上规定：今后我部对各校的指导重点，总起来说，应该是进一步地全面学习苏联，以进一步使学校纳入正常轨道”“苏联高教经验是一个整体，包括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教学内容、组织领导等各方面，有它的科学系统性，应该全面学，克服任何片面地、孤立地学习的思想和作法。”进一步鼓吹全盘学习苏修。
- 1955 由于全盘照抄苏修教育制度，结果使得学生负担过重，影响身体健康，同时也影响教育质量。而当时陆定一、楊秀峰等人，根本不听毛主席历来关于改革教育的指示。不进行教改，相反为了抵制毛主席批评，却想出延长学制的办法来解决负担问题。
- 1955.5.19—6.10 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决定“高等工业学校有必要逐步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编者注：苏联四年）并制定文教工作总方针中，要以提高质量为“重点”。

- 1955 高等学校多数由四年制改成五年制，个别学校还延长到六年。陆定一还亲自出马搞了一个八年制的医科大学。
- 1955 毛主席指示“学少一些，学好一些”
- 1956.3.6 刘少奇召集教育部同志汇报工作时讲话极力鼓吹培养专家。说什么：“普及教育当前还不是那么紧，当前还是高等教育，还是专家的问题。因工厂有钱，有材料，有工人，缺少的是专家。”
- 1956.6 刘少奇对教育部的指示：“教条要学，《圣经》要读，问题在于运用。历史课本没有教材，《资治通鑑》也可以读。”
- 1956 再度发生学生负担过重现象。主席指示：“课程要砍掉一半”。楊秀峰不但向学校传达主席指示，反而在部内叫喊说：“砍一半做不到”。
- 1956.6 刘少奇对教育部的指示：“开开会，发现干部，总结经验，这就是体现党的领导。发现优秀教师、校长人材是领导的主要任务。在学校内决定一切的问题是教员。”歪曲党的领导，鼓吹教授专家治校，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制造舆论准备。
- 1956.7 刘少奇谈到高级党校课程安排时说：“目前高级干部迫切需要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门科学较难懂、难学，基础较差，故以这两科为主较适宜。”绝口不谈学习毛著。
- 1956.7.初 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工作的讲话提出“真正学习，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自己思想”，这实际是“十六”字方针的翻版，以对抗中央批评。在同一讲话中还大肆宣传向苏联学习：“我们同苏联搞好团结，学习苏联经验是肯定不够的，学习社会主义经验，只有苏联一家。”“和苏联专家的关系，一定要搞好。搞不好关系；有理无理三扁担，这是政治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漠视这个问题。”
- 1956.8.14 毛主席指示：“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吃过教条主义的亏。什么都是照抄外国，硬搬外国，结果是一个失败……学外国的东西，不等于统统进口，硬搬外国的。要批判的吸收。”
- 1957 毛主席严厉地批评教育部说：“究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还是苏联的教育部？”而楊秀峰等人对主席的批评竟无动于衷。
- 1957年 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表现得异常尖锐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赤膊上阵，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反右斗争取得辉煌的胜利。同时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目标，而刘邓即提出“红色专家”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
- 1957.2.28 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光辉著作。在这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 1957.2.27 毛主席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



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同时特别强调指出：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1957.3.12 毛主席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光辉著作。对知识分子改造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等重大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1957 刘、邓等人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为右派进攻做好了舆论准备。

1957 刘少奇在河南许昌学生代表座谈会上说：“我看你们回乡后不当干部，认真种三、五年地。……你们有文化，农民没有，比农民多一条，再加一条跟群众搞得好的，具有这三条就能当乡、县、省的干部，还可以到中央，那就看个人的本事了。……你们是第一代有文化农民，第一代是要得便宜的。”露骨地宣扬成名成家。

1957.6 刘少奇不愿学苏修所造成的恶果，继续对杨献珍指示，“我们同苏联搞好团结，学习苏联经验，肯定是不够的，学习社会主义经验，只有苏联一家。”

1957 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泛滥，在教育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极右分子曾昭伦（当时高教部副部长）和钱伟长等人，对苏修的一套仍感到不满足。在刘、邓、陶一伙的指使下，迫不及待地跳出，于57年6月间以“民盟科学规划小组”的名义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他们公开宣称“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妄图向党夺权。

1957.7.1 毛主席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狠狠地打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58年的教育革命做好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57.7.18 邓小平知道右派分子阴谋不能得逞，又来另一套，把教授挂上党员的招牌，来篡夺学校的领导权。邓小平说什么：“要在大学教授中发展一批党员。”

1957.9.23 邓小平在八届三次会议上说：“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苦学，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

1957.11.6 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我们的党员、团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都要下苦功学习，认真地钻研业务，良好地掌握各种专门技术和科学知识，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

“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各种专家，都应当下定决心改造自己，全心全意地为工人、农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个人利益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中，而不是放在集体利益之上，这就是红色专家。”

1957.11.17 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并作了重要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957.12 康生同志指出党校的教学方针，应当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的办校方针。

1958. 中央否定“十六字”方针。

## 1958.1—1964.2

在反右斗争取得辉煌胜利后，毛主席接着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从而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教育革命高潮，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但刘邓黑司令部百般阻挠，反对革命，配合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运用当时还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大权，逐渐实现教育战线上的资本主义复辟，扼杀了58年教育革命的成果。

1958.1 党中央南宁会议，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58. 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首次提出半工半读。并指示大中学校应当设立工厂和农场，参加劳动。

1958.2.9—1958.2.12

在教育问题座谈会上，康生同志指出：人的因素、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因素是教改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1958.2.10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群众办学，勤工俭学的方针”。

1958.3 党中央成都会议上以及同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大改变了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为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8.3 邓小平说：“目前教育方面最核心的问题，概括起来说，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一切问题都要从这个原则来考虑”。

1958.5 八大二次会议号召“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1958.4—1958.6 中共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确定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1958.5 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从此刘把毛主席首先提出的“半工半读”当作自己的首创，到处鼓吹，并恶毒地篡改了“半工半读”的本质，籍以对抗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方针。

1958.6 刘少奇对教育工作作“指示”：学校可分二类——第一种学校即全日制，第二种学校即半工半读的业余的，这二种学校都算正规学校。”

同年7月在天津大力贩卖他的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如“四小时生产、四小时学习。”实际上是宣扬资本主义的双轨制。

1958.7.8—1958.7.9

康生同志指出：“学校办工厂是件大事情，是贯彻执行党的勤工俭学号召的新阶段中的一个重点。”

又指出：“北师大学生动手集体搞教学大纲是件了不起的好事情，是教学工作上走群众路线的创举。”

1958.8.13 毛主席在天津大学视察时，指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并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又说：“不仅学生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也都

- 要办点附属工厂。”
- 1958.9 毛主席视察武汉大学时指出：“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的积极以支持和鼓励。”
- 1958.9.1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发表，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而掀起了全国关于教育方针的大辩论和教育革命的高潮。但刘、邓、陆、蒋将这个口号迅速接过去，只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篡改了本质。
- 1958.9.10—1958.9.20 刘少奇歪曲“半工半读”，企图取代，否定党的教育方针，同时，邓小平积极配合，更露骨地跳出来妄图阻挠教育革命，他在视察东北时说：“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无论如何不能削弱基础课程。”又公然说：“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结合教学内容，全力做好尖端科学的研究和实验。”
- 1958.9.19—1958.9.28 刘少奇在视察安徽时再次恶意歪曲党的教育方针说：“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工厂里应该出大学生、出技师、出工程师、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干部。”绝口不提出劳动者。
- 1958.10 刘少奇亲自出马直接诬蔑教育革命，他在视察合肥工大时说：“教育质量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学生关心，教师关心，我们也关心。”“就象土改和合作化搞得不好也可以暂时降低农业生产，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中，是否会降低教育质量，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暂时降低教育质量。”他又说：“现在大学要以读为主。”企图把刚从书堆里拔出来的青年又拉进死胡同，扼杀刚起来的教育革命。
- 1958 年底 在刘邓带头大唱反调以后，杨秀峰、蒋南翔都开始活跃起来，杨秀峰大肆攻击教育革命，借苏联顾问之口，诬蔑年青人过分狂热，叫嚷：“有降低教师作用的倾向。”
- 1958 年底 在这一年，全国人民，革命师生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顾刘邓黑司令部的抵制、反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文化革命，大大冲击了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在群众运动中创造了大量新生事物，半工半读学校相继开设了，全日制学校开办了许多工厂、农场；学校的教育开始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如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等，同时也进行了教学的改革，如学制、教学大纲、教材等的改革工作，一片新的气象。
- 1959 年 教育部党组正式提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口号，和“教学秩序搞乱了”的污蔑相呼应，开始否定教育革命成果。
- 1960.8 林彪同志指出：“学校教育要实行两个原则，一要少而精，二要短而少。学制要改革，时间不要太长。”

- 1960.10.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并指出“在理论学习方面，只是讲什么‘完整的’、‘系统的’学习书本、规定几种课，每种课多少章节、多少时间，而不重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完整’和‘系统’是糊涂的概念”。
1960. 彭真祭起“未立不破”的法宝，为教育、文化战线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作了理论准备。
- 1961.1 林彪同志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一整套学习毛著方法，并提出了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是“四个第一”，使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促进了思想革命化，为全国人民作出了榜样，也为各级学校作出了榜样。
- 1961.4 在刘邓支持下，陆定一公开恶毒诬蔑毛泽东思想，说：“你们在写教科书时要注意，曲解不好，不要贴毛泽东标签”并挥舞“简单化”“实用主义”“庸俗化”等大棒疯狂诋毁和仇视林彪同志的指示。
- 1961.4 陆定一、周扬制定了修正主义的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
- 1961.4 林彪同志指示：“既要‘言教’，又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
- 1961.7.30 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题词，指示：“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给江西共大的师生以极大鼓舞。
1961. 由蒋南翔负责草拟的修正主义教育纲领“高教六十条”出笼，7—8月份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即说：“这是个好文件”又说：“原稿上兴无灭资可以不提。”还说：“右派教师也可以起主导作用。”
- 在刘邓彭陆的支持下，以中央名义、发全国推行，从而在教育战线上在全国范围搞起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文件是修正主义教育纲领，削弱党的领导，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宣扬政治落实业务的修正主义观点，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大开方便之门，全盘否定了58年的教育革命成果。
- 1961.7 蒋南翔在座谈高教六十条会上说：“高等学校工作中要抓住三个根本问题，第一是继承性，第二是稳定性，第三是一切经过试验。”和毛主席58年视察天津时的讲话公开对抗。
- 1961 年以后 在刘邓大黑伞支持下，由陆定一公开疯狂诬蔑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陆说：“教育方针提出不久，有许多同志不满意，左的东西就出来了……认为共产主义学校必须搞半工半读……认为劳动愈多愈好，愈多愈共产主义。”“很多大学搞改革，我采取观望态度，中央文教小组从来没有提倡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又叫嚷：“教学质量提高了，我怀疑，有所提高，有所降低吧！着重是有所降低。”并公然发出反革命叫嚣“谁要办白专学校，我批准。”
- 1961 年以后 在高教六十条出笼以后，刘邓陆蒋大砍教育革命成果，教育革命中群众办的学校，如21所半工半读的高等学校差不多都被停办。只有江西共大个别学校艰苦地坚持了下来，大、中学校办的工厂、农场纷纷下马。
- 1961 年以后 教育部在大抓“全日制”，大抓“重点学校”，大抓“提高质量”，大抓

“稳定教学秩序”的幌子下，开了一系列会议，复辟被 58 年教育革命所冲破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如 57 年明令停止试行的《教师工作量、工作日试行办法》《考试、考查规程》又重新搞了起来。生产劳动被砍掉。在专业划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内容，又基本恢复了 58 年前的修正主义老一套。

1961年以后 由于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很多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削弱，对困难时期社会上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不闻不问，根本不提知识分子的思想革命化和劳动化，有的学校如清华大学大搞什么“按热量办事”，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宣扬“红落实到专”的修正主义观点，业务挂帅，分数挂帅，理论至上，物质刺激重新又有了市场。

1961年以后 杨秀峰、蒋南翔忠实地执行刘邓意图，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蒋胡说什么：“在高等学校中，党员干部必须和党外专家合作，实行两种人会师。”又说：“我们的工作和愿望出发点是团结百分之百。”在彭真指示下，搞起了全国性教材编审委员会，网罗了全国所谓“名教授、名专家”大搞专家路线。62年更安排了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任院校长，抬高他们的统治地位，党的领导大为削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了学校的大权。

1962 招生委员会取消了工农子弟优先录取的规定，把大量的工农子弟排斥在学校之外，也就在这一年，各高校借口提高教学质量，让大批工农子弟退学，拒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1962年夏 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居心叵测的口号。

1962.8. 刘少奇把他的《论修养》修改再版，大量发行，妄图抵消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并恶毒地提出“作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来对抗林彪同志的“作毛主席的好学生”。

1962.9.24.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开始了全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 在刘邓支持下，国家科委草拟了一个关于学位学衔的制度，由邓小平审查批准，同时教育部颁发“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纪要”和“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企图为修正主义高薪阶层开辟道路。

1963.5.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 1964.1—1966.8

在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教育工作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强调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重新点燃了教育革命的烈火。但却遭到了刘、邓、陆、蒋的百般阻挠，抵制，负隅顽抗。

66年，毛主席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夺取了教育界的领导权，为彻底的

教育革命开辟了道路。

1964.2. 毛主席发表了春节指示，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害死人，要终止。深刻地揭露了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阶级斗争。

1964.3.10. 毛主席给北京铁路二中报告的批示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进一步强调教育革命的必要性。

1964.3.底 在刘邓支持下，陆定一亲自出马，恶毒攻击主席指示：“革命革下去会遇到困难，国内如此，国际也是如此。高教部召开直属高等学校（扩大）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春节指示，杨秀峰急忙抛出“思想积极、行动稳妥”的口号，提出“三不动”，即学制不动，专业设置不动，教学计划的大框框不动。来与毛主席的春节指示相对抗，蒋南翔还企图以“少而精”来把广大师生局限在一门课程的狭隘范围内，企图把教改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同时在会议上蒋南翔只提“四改”问题，偏偏不提阶级斗争，歪曲毛主席指示精神。

1964.4. 高教部召开全日制教改座谈会强调“实事求是，有破有立”，“反对急躁情绪和片面现象”，不给地方以教改的机动权，对抗主席春节指示。

1964. 蒋南翔在呼和浩特会议上公开宣扬说：“学校里一要政治挂帅，一要教学为主，‘挂帅’是使为主更好些”“教学为主，就要提高教育质量”。

1964.7. 毛主席发表七·三指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号召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指出：“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强调学校“上面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1964. 毛主席在《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批示中号召“现在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校也要学解放军。”要“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

1964.7. 毛主席发出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伟大号召，各地院校掀起一个大学解放军的高潮。陆、蒋互相呼应，大肆攻击“解放军院校的经验不适合于地方学校”。叫嚷解放军的经验不能搬到高等学校。高等学校迟迟不设立政治部。刘少奇更露骨反对学生参加四清，说：“不要因参加四清，学习质量降低。”

1964.7. 毛主席提出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1964.8. 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借学生负担长期减不下来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大反“形而上学”只砍课外，不砍课内，抵制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1964. 刘少奇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并存，五年试验，十年推广”。并跑到十几省市，大放厥词近二十次，大肆吹捧他的黑货的优越性，绝口不谈毛主席的七·三指示。他还亲自组成一个教育办公室，打算成立第二教育部，第二教育厅来贯彻自己的主张，与毛主席分庭对抗。

- 1964.8.2. 刘少奇在和中央学制问题小组的同志谈话中大力歪曲半工（农）半读，“四年中学以后，再加上三年技术教育，就可以培养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人才来”，并说：“这样的学生出来以后，就可以做各种工作，可以当工人，将来也可以当车间主任、厂长，党委书记等等。”
- 1964.8.22. 刘少奇在广西会议上贪天之功占为己有，吹捧半工半读是他的“首创”，并说：“就是我们新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重新教育出来的一种新人，他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这一种人，就是我们的前途，我们国家的前途，我们所有人的前途。”歪曲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
1964. 毛主席与王海蓉谈话，又强调现行教育制度对青年的毒害，号召学生起来造学校的反，也就是起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 1964.9 毛主席和毛远新谈话强调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最重要地要到实践中去学习。明确提出学生应参加一期四清。
- 1964.9 在毛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下，北大、北师大等一些高等院校试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 秋 教育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掀起了揭发冯定、杨献珍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高潮。但陆定一、何伟公开镇压，不准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反动毒素的教材。
- 1965.3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为北大社教运动捏造了三条“罪状”
1. 把问题性质搞错了，一开始就以烂掉了的单位夺了权；
  2. 没有实行三结合；
  3. 斗争方式上有严重毛病。
- 污蔑革命左派是“踩着别人肩膀向上爬的势利小人”，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改组了工作组，邓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北大形势有个估计，这个学校是比较好的……陆平还是个好同志。”为陆平打气说：“欣赏彭佩云的发言。”说陆平的发言“态度是好的，意见是正确的。”公开镇压北大的社教运动。
- 1965.3 在中央书记处会上，邓小平极力攻击64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运动是“过火了，妨碍繁荣。”应“立即刹车”，攻击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是“空论对空论”，“人海战术，爆破组”。
- 1965.3.11 刘少奇在全国半农半读教育会议上极力贩卖他的两种教育制度，说什么“半农半读本身就是阶级斗争。”“两种教育制度也是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方法之一。”企图否定社教运动和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意义。
- 1965.3.11 刘少奇在全国半农半读教育会议上极力主张：“耕读学生时间可以比全日制学校延长半年或一年，课程不要缩减了”，“年限不要定死，四年不够，可以延长一年，功课要学好，多一年没有关系。”反对缩短学制，和减轻学生负担。
- 1965.5 蒋南翔在部长办公室会议上，公开宣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污蔑同学“把主席语录当白教咒来念。”大肆攻击高等学校语录进课堂，别有用心地搜集所谓“形而上学”的例子，汇编在《教育简报》第22期上。

- 1965.7.20 刘少奇在农业部江一真汇报农业教育工作时，极力抵制反对学习主席著作，说什么“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只学毛选不行，还要学点马列主义，……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作教条。”并说有了半农半读的制度，就可以充分满足他们升学的愿望，谁愿意上就行。”这样做是“划得来的”，“不会折本的”，“会赚钱的”等等。歪曲半工半读的意义。
- 1965.8.3 蒋南翔在高教部党委学习会上说：“有人认为全日制不革命，如果不注意这股风，可要走五八年的老路。”大喊“二十八所直属高等学校的阵地要守住，要巩固，要加强。”对抗毛主席的半工半读指示。
- 1965.8 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又指出了现行学校一套制度对学生的毒害：“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
- 1965.9 陆定一叫嚷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扩大招生是“步子太大了”，“千万不要一哄而起”，对全日制极力维护，在六四年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上，冷言冷语说：“至于高等学校，对不起，没有经验。要有经验，是否还要十年？特别是研究生的培养，毫无经验，一点办法也没有。”
- 1965.10 陆定一在高教部政治部工作会议上明目张胆地对抗主席六四年春节后关于教改的一系列指示，说什么会议“只讨论一个减轻学生负担，减少课内外活动问题，恐怕太窄了。”
- 1965.11.6 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半工半读扩大会议上极力维护旧型正规化的教育制度，提倡“全日制和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城市全日制初中，农村全日制小学，不要提停止发展，这一条路不要堵死。”企图使教育制度纳入资产阶级双轨制。还盗用毛主席的名义，美化刘氏“半工半读”制度：“半工半读学校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不是讲过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吗？我们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
- 1965.11.15 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说什么：“全日制学校的改革也要抓。如何改革，要开一次会，看不准，千万不要瞎指挥，改革的重点也是要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1965.11.9 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恶毒反对高等学校三八作风，说什么：“大学嘛，就是要他悠哉，游哉和松松垮垮的。”
- 1965.11 毛主席在上海亲自批发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 1966.2 一月下旬，全国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后，《高教战线》迫不及待地发表社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积极试办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大力鼓吹全日制，极力贬低半工（农）半读：“全日制高等学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有其特定的作用”，“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方面，还承担着较多的责任”，“而半工半读高等教育在提高科学水平方面，势必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 1966.3 何伟在四川说什么：“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个方向，不要过急”，“要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才能把学校改好。”



規模席卷全國。為了徹底批倒批臭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徹底砸爛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我們編寫了這份《高等教育領域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向革命戰友們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讓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批判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徹底肅清它在各個領域內的流毒，挖掉修正主義的總根子！

## 第一時期

(1949年10月—1952年12月)\*

毛主席歷來重視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歷來重視教育革命。毛主席對於無產階級的教育路線、教育制度，有着一系列極其光輝的論述，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我國無產階級教育事業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早在1934年，毛主席就提出了蘇維埃區的教育方針：“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繫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40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全面地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極其深刻地揭示了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係，毛主席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毛主席在偉大的抗日戰爭期間，親手締造了世界聞名的抗日軍政大學。抗大在毛主席最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主持下，全面貫徹了毛主席的偉大教育思想，堅決執行了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教育方針，培養和造就了大批堅強的革命幹部，為無產階級教育事業積累了系統的豐富的經驗，成為無產階級教育事業的光輝旗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隨着人民大革命的勝利，我國教育事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當時，全國存在着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學校；一類是老解放區創設的抗大式新型學校；一類是新解放區的歐美式的舊大學。高等教育事業迫切需要解決如何適應新政治、新經濟的問題。是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由黨來領導教育，把領導權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繼承和發揚老解放區辦學的革命傳統，以抗大為榜樣，有步驟地改革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呢？還是反其道而行之，背離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拋棄老解放區辦學的革命傳統，依靠所謂“專家”“教授”，把領導權拱手交給資產階級，維護舊大學歐美資產階級教育的一套，這就是當時高等教育領域里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關鍵問題。

### 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指出：“隨着經

這一時期，馬敘倫任教育部長，錢俊瑞任第一副部長、黨組書記。

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毛主席還一再強調：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

與此同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為了把我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極力宣揚“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到處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的所謂“進步”和“光榮”，製造“剝削有理”的反革命謬論，并把黑手伸進高等教育領域。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十一天，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胡說什麼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並且當着他們的面說：“確定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在座諸位大多數在內。”這個反革命謬論，為解放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繼續統治學校定下了調子。

12月，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教育部領導人錢俊瑞等，秉承劉少奇的意旨，千方百計地污蔑和貶低老解放區的教育事業，他們大叫大嚷：“老解放區的經驗是長期農村環境與戰爭環境中的產物”，“今後主要的任務將由戰爭轉入全面的建設”，因而，老區辦學經驗“過時了”。對於新區的舊大學，他們則愛護備至，大談什麼“我們在新區堅決執行維持原有學校，逐步作可能與必要的改善的方針”，“絕不要採取急進的冒險的改革”，公開抵制和反對毛主席關於改革教育的重要指示。

### 1950年

這一年，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階級鬥爭十分尖銳。

被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吹捧為“愛國主義”影片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在天津、上海和全國其他城市大量放映。毛主席嚴正指出：“《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還說過：“《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可是，在劉少奇的支持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人，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抬出劉少奇的黑話，硬說它是“愛國主義”的，拒絕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這是我國解放後文化思想戰線上的第一次重大的鬥爭。

在高等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的鬥爭也進一步發展起來。

解放初期，高等學校廣大革命師生積極投入各項政治運動，在實踐中經受了鍛煉，提高了政治思想覺悟，迫切要求改革舊的教育制度。

但是，貫徹執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教育部領導人錢俊瑞等却千方百計拖延和抵制教學改革；統治高等學校的資產階級分子則極力維護舊大學的一套，用繁重的課業負擔阻撓青年學生參加政治鬥爭。

這時，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應當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毛主席特別着重地批判了盤踞在教育領域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只講維持、不准改革的錯誤。毛主席在當年六月和第二年一月兩次給馬敘倫的信中，又強調了學生健康的重要性，明確指出了“健康第一，學習第二”。可是那些資產階級老爺們拒不貫徹。

6月，在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兩條路線進行了激烈的交鋒。錢俊瑞等人秉承劉少奇的意旨，在会上拼命鼓吹所謂“正規化”，否定老區辦學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向

毛主席的教育路線发动进攻。他們胡说什么：老区的新型大学“在今天多半还保持短期訓練班的性质，尚未完全发展成为正規的高等学校”、“质量不高，远远不能滿足各項建設工作的要求。”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防止不顧长远利益与全面利益，輕視理論学习的狹隘的实用主义。

10月3日，刘少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線，否定按照毛澤东思想創立的老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公然宣称：“人民大学是我們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这个大学是“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所沒有过的大学”；恶毒地攻击老解放区的大学，“都是政治訓練班性质”，不能培养“建設新中国的干部”。他还为資产主义教育制度歌功頌德，抹煞旧大学为反动統治階級服务的反动本质，胡說旧大学“是有成績的”，极力拖延对旧大学的改造。同时，他还奴性十足，大肆吹捧苏联“专家”的作用，说什么“沒有他們的帮助，我們的大学是办不好的。”刘少奇的黑講話，給盘踞在高教戰綫上的資产階級代理人撑了腰。他們一方面竭力維護旧大学，一方面揮起“老区学校逐步正規化”的大斧，从1950年到1952年，采取停办、拆散、“全盘苏化”的办法，把抗大式的学校一一砍掉。

解放后，高等学校师生根据中央指示和老区学校的革命传统，积极参加各項政治运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課采取整风方式改造思想。这些，受到資产階級老客們們的激烈反对，被污蔑为“山沟沟里的作法”。与此相呼应，10月和次年7月，教育部发出“通报”和“指示”，明文規定：“高等学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要采取思想总结、思想检查、整风、……的方式”，“政治課应作为业务課之一，着重于系統的理論知識的讲授”，“要糾正和防止把政治課只满足于临时的社会政治活动或片段的思想問題的解决，而忽視系統的理論知識的偏向”，还公然提出“評定成績以理論学习为主要标准，由教員負責評定”。

这一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罪恶的侵朝战争。我們的伟大領袖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军，爭赴前綫。他們还配合人民政府接办了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教会学校輔仁大学。次年，全国范围内全面接办了接受美帝津貼的教会学校。

## 1951年

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判反动电影《武訓传》的斗争。广大师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了这一批判运动。

4月，各高等学校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镇压了一批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打击了資产階級反动气焰。

10月，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思想改造运动。10月23日，毛主席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會議的开会詞中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們預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这次运动着重从政治上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划清敌我界限。从10月起，这个运动与社会上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密切結合，在全国高等

学校中迅速地发展起来。到次年暑期，整个运动告一段落。通过运动，进一步提高了革命师生的觉悟，紛紛要求改革欧美式的教育制度。

## 1952年

夏季，在思想改造运动的基础上，各高等学校先后建立党委会，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

为了适应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央决定，（1）私立大学一律取消，并入其他学校；（2）大量举办专修科，从全国机关、部队抽調干部×万人，入高等学校学习；（3）进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以便集中各校人力、物力，适应扩大招生的需要。

就在这样一个重大变革的时候，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竭力地要把高等学校的改革引向歧途。7月，他在对留苏学生的講話中，大肆吹捧基本上沿袭沙皇俄国一套未經根本改革的苏联教育制度，说什么苏联的大学比中国的大学“办得好”，为抛弃老区办学传统，照搬苏联教育制度制造輿論。在他的指揮下，从下半年开始，各高等学校按照苏联大学的样子来設置专业、專門化，照抄苏联教学計劃，引进了苏联教材，离开了毛主席指引的改革方向。在这次講話中，他还鼓吹“階級斗争熄灭論”说什么：“革命搞得差不多了，敌人已經打倒”，“你們学习的任务是建設，是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的落后現象”，企图引誘青年离开革命化道路，把青年培养成資产階級接班人。

## 第二个时期

（1953年1月—1957年12月）※

1953年到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这五年里，階級斗争非常尖銳，非常复杂。

1953年，我們最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亲自制訂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全国人民掀起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这时，以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为代表的資产階級反动势力，极力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粉碎了他們的猖狂进攻，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

在这一时期中，国际上，自从伟大的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逝世以后，現代修正主义总头目赫魯晓夫逐步篡夺了苏联的党、政、軍大权，背叛了列宁的遺訓，走上了复辟資本主义的

※ 1952年12月26日，高教、普教分成两个部。高教部，马叙伦任部长，杨秀峯任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1955年，杨秀峯任部长。

道路。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以后，又发生了波匈事件，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了一个反共反华的高潮。刘少奇与赫鲁晓夫一唱一和，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国内的牛鬼蛇神乘机纷纷出笼。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我党整风的机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梦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这一时期中，高等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极其尖锐、激烈。盘踞在高教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刘少奇的指挥下，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以“全盘苏化”为纲领，大肆推销所谓技术至上、理论至上、专家至上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的黑货。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推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呢？还是照搬苏修货色，走修正主义的道路呢？是这个时期斗争的焦点。

### 1953年

5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教育工作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问题，而且要首先解决大学的领导骨干问题。毛主席说：“有了坚强的校长，就会产生好的教员。”毛主席指示说，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法。毛主席指出，中央教育部要把提高学校领导骨干与教师，指导编写教材，当作两项最基本的任务。并强调说：“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着重一些。”毛主席又指出，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毛主席说，要吃得饱；学得太多，可少学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消耗。

6月，毛主席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对青年的成长极其关心。他亲切地说：“我给青年讲几句话：一、庆祝他们身体好，二、庆祝他们学习好，三、庆祝他们工作好。”并且明确地指示说：“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们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

但是，在刘少奇的支持下，盘踞高等教育战线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然抗拒毛主席这些极其重要的指示，继续大规模地推行“全盘苏化”。

7月，在高教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上，杨秀峯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修正主义口号，大肆贩卖“业务第一”的黑货。在会上，曾昭伦（当时为高教部副部长，大右派）叫嚣：“整个学校应该成为以教学工作为中心的一个有机体。”他在会上还大肆鼓吹“全盘苏化”，胡说什么苏联高等教育“应该是我们长期学习和不断努力的目标”，“我们应该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关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组织和制度等一系列的、全面的改革。”

9月，高教部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杨秀峯等公然在会议上宣扬“技术至上”，提出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就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材”。

6月和9月，高教部在青岛和上海分别召开理科和工科学学校修订教学计划座谈会，照抄苏联教学计划，制订全国的统一教学计划，强制在全国推行。并照搬苏联的培养目标，明文

规定高等学校要培养“工程师”、“学家”。

### 1954年

国际上，苏联自从斯大林逝世以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复辟活动日益加剧；国内，各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

毛主席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资产阶级反动学阀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高等学校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斗争。10月16日，毛主席写信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指出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批判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指使陆定一、杨秀峯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加紧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杨秀峯等人到处召开会议，发表讲话，不仅坚持照抄苏联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且要把苏联高等教育中的一整套规章制度也完全抄袭过来。

4月，高教部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杨秀峯在会上大肆宣扬入大的“成绩”，说什么取得成绩的原因，“主要是全面地、系统地、有计划地并全心全意学习苏联的结果”；“他们的经验证实了不仅是苏联的科学对我们有指导意义，而且苏联高等学校的办学精神，以及各项制度办法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月到11月，高教部又先后召开财经、政法、医学、农林各类高校的教育会议。杨秀峯在农林教育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我们的教育改革还开始不久，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教育经验，还远不系统和深入，……因此我们提出‘必须更进一步地全面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地说：“两年多来的经验证明：学校进步的快慢，办理的好坏，关键在于是否积极地、认真地、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7月，高教部发出《1954—1955学年工作计划指导要点》，宣称“今后我部对各校的指导重点总起来说，应该是进一步全面地学习苏联，以进一步使学校纳入正常轨道。”“苏联高等教育经验是一个整体，包括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组织领导等各方面，有它的科学系统性，应该全面地去学，克服任何片面地孤立地学习的思想和作法。”

同月，高教部颁布《高等学校课程考试与考查规程》，照抄苏联同样的规程，只讲业务不讲政治，大搞“分数挂帅”。

8月，高教部召集大连会议，照抄苏联教学内容，审订了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32种。此后，又制订了大批的统一教学大纲。

9月，高教部提出《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和工作日试行办法（草案）》。这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黑货。在这个文件中，教师的劳动也竟然被分成高级与低级。这个“试行办法”，给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种种特殊条件，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 1955年

解放以来，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1955年5月起，全国人



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批判，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接着，又开展了肃反运动，在高等学校中挖出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由于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全套搬用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1954年下半年、1955年上半年出现了全国性的学习负担过重的严重现象，极大地影响了青年的全面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严肃地指出：必须注意学生的健康，要“学少一点，学好一点”。

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继续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刘少奇在参观清华大学时，别有用心地一再提出：解放后学校“是否比解放前质量降低了？”他还否定教育事业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开门的根本方向，说什么：“工农速成中学可以暂停招生，三年速成不是实事求是的，学习上不能取巧，也不能降低要求”，“统一招考时，对工农加50分录取是不对的”。他继续鼓吹向苏联学习，说“应该派一点助教去留苏，将来他们也可以变成教授”。同月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主持下，举行了全国文教会议。这次会议不提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历次重要指示，却大肆吹捧刘少奇在清华大学所作的一套黑指示，提出：今后的文教工作以提高质量为重点；高等学校首先要严格招生条件；综合大学理科和高等工业学校要分期分批有步骤地延长学习年限。

7月，高教部举办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教师讲习班，聘请苏联专家传授“经验”，以所谓“理论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为借口，抵制毛泽东思想，反对在政治理论课程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8月，高教部发布《1954年工作总结和1955年工作要点》，提出“如不延长学习年限，势必过分降低标准，这样就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的要求，因此，首先将高等工业学校和综合大学逐步改为五年制。”此后，学制越来越长。不仅大部分学校逐步改为五年制，清华和北大部分专业还改为六年制。1960年，陆定一竟然把中国医科大学改为八年制。

## 1956年

这一年，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一年內，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4月，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针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日益猖狂的复辟活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在中国和外国的问题上，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不可盲目地学，要有分析，要有批判地学。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国的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运。”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给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航向。

但是，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分恐惧。他们利用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国际上掀起的反共反华逆流，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

7月，刘少奇与赫鲁晓夫遥相呼应，在与杨献珍进行黑谈话中，恶毒地把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并且，反对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论断。9月，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又胡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刘少奇一方面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从党章中删去；另一方面

却对赫鲁晓夫和臭名远扬的苏共二十大大加吹捧，说什么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新发展。”在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煽动下，一时资产阶级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右派言论到处泛滥。高教领域是右派猖狂活动的主要阵地之一。

4月，高教部颁布《关于1956年进行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几项规定》；5月，颁布《高等学校考试条例》；6月，颁布《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奖励暂行办法》；7月，颁布《1956年高等学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暂行办法》；9月，颁布《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划》。此外，还草拟了《教师学衔授予办法》等多种规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秀峯等人利用这一系列规章制度，大搞物质刺激，培养特权阶层，巩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

7月，高教部举行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哲学暑假讲习班，请苏联专家作专题报告，向政治教师灌输修正主义谬论。

8月，杨秀峯在高等学校部分校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上公开宣称：“建国初期……将苏联建国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的高等教育一套先进经验照搬过来……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不能说它是教条主义。”甚至说：“就是在今天，有些东西我们还不不懂，由于迫切需要，也不得不先搬运过来，……这也不应该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在团委书记暑期学习会上，他又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应以专业知识教育为中心环节”，疯狂抵制毛主席的指示。

11月，高教部又派出以曾昭伦为首的访问团赴苏，学习苏联修正主义的教学经验，回国后大量印发访苏报告，流毒全国。

## 1957年

2月，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3月，毛主席发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针对教育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毛主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又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3月，在一次座谈会上，毛主席对当时的教育部领导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主席说：教育部是苏联的教育部还是中国的教育部？如果是苏联的教育部，就要取消你们的教育部。同时又提出：课程不要那么多那么高，要砍掉一半。

与此同时，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加紧进行活动。3月、4月，刘少奇亲自出马，在河南、湖南、上海等地，向学生、教师、干部多次发表讲话，煽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咀，不动手”。又說：“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書本上的道理怎么成？”9月，毛主席視察武汉大学时又指示：“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趨勢，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給他們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他还指示，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的集中群众的智慧。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重要指示，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师生，把教育革命推向新高潮，高等教育战线上呈現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教育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吓坏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他們仇視三面紅旗，把教育大革命視為洪水猛兽，从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进行抵制和破坏。

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次會議上，重弹培养“紅色专家”的濫調，同毛主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唱对台戏。他在到江苏推銷黑貨时，竟公然用他的“紅色专家”的资产阶级道路对毛主席所倡导的半工半读进行歪曲和篡改，說什么：“工厂里应该出大学生，出教师，出工程师，出干部”。邓小平也大唱反調，胡說什么“目前教育方面最核心的問題，概括起来說是普及提高的問題，一切問題都要結合教学內容，全力做好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試驗”，否定教育革命的必要性，不要教育革命。刘少奇又提出反动的“馴服工具”論，公然与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妄图用奴隶主义的枷鎖，束縛群众的手脚，阻碍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 1959年

这一年，在刘、邓的支持下，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反对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教育方面，刘少奇这时也急不可待地抛出“認真讀書”的口号，发出反扑教育大革命的信号。彭真、陆定一、林枫、楊秀峯、周揚、蔣南翔之流紧紧跟上，刮起了一阵黑风。1月至3月，旧中宣部召开教育工作會議，否定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进行所謂“糾偏”，妄图扭轉教育革命的方向，提出“以教学为主”的原則，与“教学秩序搞乱了”的誣蔑相呼应，反对教育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提出“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的口号，反对教学中的群众路綫，压抑青年学生的首創精神。在会上，陆定一还印发了楊秀峯提供的苏联顧問西涅斯基恶毒攻击我国教育大革命，系統宣传苏联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談話記錄，借苏联专家之口，制造反对教育大革命的輿論。

6月，刘、邓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共青团中央《关于学校进行評比竞赛和建立教学秩序的报告》，批示說：“提高教学质量，在目前最重要的措施，应当是把正常的教学秩序建立起来，使教师能有充分的時間备课和批改作业，使学生能有充分的時間讀書”。同月，教育部在青島召开的工科院校长座談会上，正式提出了“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口号。

8月，中央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会上，彭、黄、张、周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对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反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粉碎了他們企图把历史拉向后退的罪恶阴谋，給刘、邓当头一棒。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傾机会主义的思想”，要求各級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

右傾机会主义的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跃进計劃。会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傾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10月，林彪同志提出：“政治是根本的东西，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不做好，其他一切工作就都会无从談起。”強調了政治挂帅的重要性。

## 1960年

上半年，在反右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全国又出現新的跃进局面，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蓬勃开展。在高等学校中，广大革命师生积极投入了双革运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普遍开展了学术批判。文科师生还积极参加了社会上对资产阶级反动学者馬寅初、反动文人巴人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

8、9月間，林彪同志对军事院校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強調要贯彻“少而精”、“短而小”的原則，“教学內容要精簡，要压缩”，“教学方法要簡明易懂，……模型、圖表，多种多样”，“学制要搞短”。林彪同志这些認真贯彻毛主席教育思想的指示，对全国的教育工作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9月，毛主席的光輝著作——《毛澤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林彪同志号召全軍“读毛主席的書，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全国人民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反右傾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引起了阶级敌人的更大仇恨。这一年，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更加猖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3月，教育部草拟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暫行規定》，規定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級，维护资产阶级法权。3月至5月，旧中宣部召开省市文教书記會議，陆定一在会上疯狂地反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学术批判，說什么“对学术思想批判不能无把握地铺开，不应打乱仗”。同时发表文章，胡說什么“教学改革的試驗，需要較长的時間，不应过早作出全面結論”，妄图阻止教学改革。1959年3月至1960年7月，苏联修正主义面目已經充分暴露之后，楊秀峯还再三命令《教育簡报》不断刊登苏联和东欧修正主义国家的所謂“經驗”，继续散布毒素。

11月，旧中宣部召开了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以贯彻“調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針为名，行复辟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之实。陆定一、林枫之流大肆反攻倒算，攻击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叫嚷什么“在学术文化领域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鳴的方針贯彻执行得不够，簡單粗暴，片面性的現象有所滋长”，又恶毒誣蔑革命教育事业的大跃进，胡說什么在文化教育工作中“存在着‘五风’、‘五气’……貪多貪大，追求形式，讲求排場，产生一些盲目急躁情緒和不切实际的做法，……瞎指揮风不少”。在會議的文件中提出：“高等学校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現在全日制学校应切实保证教学時間，劳动時間应有所控制”“教育部应当在較短的时间內，……修訂各主要科系的教学計劃，編好主要教材”，祭起了资产阶级“业务挂帅”的法宝，妄图把学校再拉回“关门讀書”的老路上去。會議文件又提出“新建的高等学校必須調整，……其中很多条件很差，应分別予以保留、充实、合并或者撤銷”，要大砍在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兴办的新办学校。还反对科学研究走群众路綫，說什么科学研究工作“战线不要拉得过长”。又提出要“注意提高师資和培养研究生的工

作”，否定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在战斗中成长，要把他们重新拉回旧式的培养道路上去。这次会议全面地否定了教育革命。此后，高教战线上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泛滥。

## 1961年

1961年，是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向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疯狂反扑的一年。

从年初开始，刘邓就打着“调查研究”的旗号，派林枫亲自出马，率领蒋南翔、杨述、吴子牧、彭珮云等反革命干将，到他们的重要据点北京大学进行所谓“调查研究”，捏造攻击教育大革命的口实，为实行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他们在所谓《调查报告》中，从维护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出发，恶毒攻击教育大革命，叫嚣“政治运动安排得不妥当”“劳动也安排得多了”没有贯彻“以教学为主”，“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削弱了“系统讲授”，“对教学质量影响甚大”。又大肆诬蔑青年师生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简单化”，说青年师生运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是“拿几个现成的公式到处套用，乱贴标签。”他们还大捧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说“老教师对本门学科知识较博，掌握资料较多，见闻较广，治学经验丰富，在业务上有某些独到的见解，有些反面意见也可提供研究。”他们还叫嚷要“调动老教师的积极性”，“只要求他们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不勉为其难地要求他们批判其中的错误思想”，支持和鼓励资产阶级教授继续出来霸占讲坛，大肆放毒。他们还攻击党的领导，说什么总支一级“管得太宽太多”，“实行总支领导下的系委负责制”，是“弊多利少”，叫嚷“系委会和系主任应当直接归校委会和校长领导”，党总支只起“保证监督”作用，企图削弱党的领导。

2月，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教材问题，提出了所谓“从无到有，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印刷清楚”的教材工作方针，完全否定了教学内容的改革，否定了群众集体编写的新教材。并指定蒋南翔负责领导理、工、农、医各科的教材编选工作，周扬负责领导文科教材编选工作。

3月，教育部召开理、工、农、医各科教材工作会议，提出只选编内容“稳定的”、“成熟的”教材，把教育大革命中出现的新教材排斥在外，恢复了1958年以前的一套。

4月，旧中宣部召开文科教材编选会议。会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以年初的黑“调查报告”为子弹，对教育大革命进行恶毒的攻击。叫嚷教育大革命“有些是破得不对的”，“要克服在执行教育方针里边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一些缺点甚至一些错误”。他攻击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与生产劳动，说“政治活动搞得太多，生产劳动搞得太多”，“课堂教学挤到了一个不重要的地位”，学生“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历史知识以及基本技能的训练”“削弱”了。攻击学生和青年教师集体编写教科书，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诬蔑集体科研中有些人“只是跑材料，倒茶、倒水”。他明确提出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知识不够，书本知识不够”的问题，是“审定教材”“促进教学稳定”“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充分暴露了他复辟资产阶级“教学秩序”的狼子野心。

为了在这次会议上制订出一个系统复辟资本主义的教学方案，周扬提出了一系列与教育大革命针锋相对的原则。在培养目标上，他大弹刘少奇“红色专家”的滥调，叫嚷大学就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材”。对学生的政治要求只提“要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愿意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反对提学生改造世界观、思想革命化。在政治与业务关系

上，他大肆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胡说什么“政治是统帅，帅不是兵，兵要多而统帅只有一个”，搞多了“就不是政治挂帅了”。说“学校就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提出要压缩政治课，削减参加政治运动时间。他还鼓吹厚古薄今，说学生读古代近代的东西应该比读现代的时间“要多很多才对”。根据这一系列原则所制订出的文科教学方案，从培养目标到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培养，完全恢复了1958年前的一套，在文科全面复辟了资产阶级教学制度。在教材的编写上，他又大力提倡“材料挂帅”。胡说什么“现在的教材的普遍的缺点是材料不够充实”，确定编写原则是，“材料比较充实，比较可靠”，至于观点“大体妥当”就行了。后来又提出编选教材要依靠“专家”，成立由“专家”组织的专业教材组。这个决定，获得了邓小平的亲自批准，使教材编选大权完全落在反动学术“权威”的手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货色又充斥教材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陆定一、周扬等人在这次会上，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新标签”，使得青年人“思想僵化”，“走到唯心主义去了”。后来，陆定一还叫嚷说：“主席没有针对自然科学讲话，不要在自然科学教材中乱引主席的话，不要庸俗化、简单化、乱贴政治标签。”蒋南翔即组织人力，对这次选编的理工农医的教材进行所谓“政治审查”，公然把教材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一律删去。

上半年，杨秀峰和彭真、陆定一、周扬上下呼应，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教育大革命，说什么“体制下放过了头”，“招生毫无控制，招多了”，“抽出一万学生支援大炼钢铁，……结果那个学期没有上课，违背我本意”。他全面否定教育大革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成果，叫嚷：“我同意陆部长对于教学质量的提法，有所提高，有所降低，着重是降低，有的还大为降低”，“基础削弱，课程改动，教学环节放松，搞乱了，学得不巩固”，“缺少平静的学习气氛，动不动就搞群众运动”，“运动中有许多假象值得注意，……作伪与浮夸”，体质“一般下降，浮肿、妇女病，影响深远”，“大搞生产，大搞科研，导致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相当严重”“党委包办，一是思想工作强制、压服，一是片面绝对化”。

从年初开始，教育部召开了几次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调整工作会议，大砍所谓“条件很差”的新建校，压缩招生人数，撤消新设的专业。经过两年的“调整”，到1963年，高等学校比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二，在校学生数削减了六分之一。

从3月开始，陆定一、林枫组织起草《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即高教六十条）。这是从所谓“调查研究”做舆论准备到条例化、制度化。杨秀峰亲自到天津大学蹲点，提出高等学校新的领导体制。以后，由蒋南翔负责具体的起草工作。9月，提出草案。11月，刘、邓盗用中央名义发布实行。这个文件是一个修正主义教育的总纲领。它完全否定了1958年教育大革命，复辟了资产阶级的一整套。在领导体制上，虽提出“党委领导下”，却是“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而系总支一级则只起“保证监督”作用，削弱党的领导，抬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互相勾结建立党阀学阀联合专政开辟道路。在培养目标上继续推销“红色专家”的黑货，提出培养“各种专门人材”，降低对学生的政治要求，根本不提学生思想革命化。还胡说什么“师生的红，不但应该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应该表现在他们教学和学习的实际行动中”宣扬政治落实到业务的修正主义标准。在培养的道路上，鼓吹关门教学、智育第一、书本知识至上。提出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都必须“安排得当，以利教学”，要“切实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的教学”“切实加强

基本技能的訓練”，結果大減生產勞動，大砍政治活動。還提出“必須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課堂講授是教學的基本形式”，反對發揚學生在學習中的主動精神與創造性。並排斥學生進行科學研究，提出“科學研究的主要力量是教師”，否定科學研究的群眾路線。在研究生與師資培養上，則提倡跟着資產階級教授跑，走白專道路。所有這些，就是要培養修正主義苗子，為復辟資本主義服務。鄧小平在北戴河中央書記處開會時，竟然吹捧它“是個好文件，”並說：“原稿上的興無滅資可以不提”，“六十條中教師主導作用還不突出，右派教師也可以起主導作用”！

在劉、鄧、彭、陸反攻倒算的同時，林彪同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抵制逆流。林彪同志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峯”，號召“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強調“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把毛主席著作學習提高到一个新階段。

## 1962年

1962年，是階級鬥爭十分激烈的一年。由於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和蘇修的背信棄義，我國經濟上遭到了暫時的困難，帝、修、反掀起了更高的反華浪潮，國內地富反壞右紛紛出籠，“三家村”、“四家店”猖狂活動。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與國內外牛鬼蛇神上下呼應，更加惡毒攻擊三面紅旗，大搞“三自一包”，大唱“三和一少”，並且別有用心地重新拋出他的《修養》，瘋狂攻擊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為他篡黨、篡政、篡軍的陰謀大造輿論。

在高教戰線上，這一年，復辟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罪惡活動也達到了高峯。教育部大力推行修正主義的《高教六十條》。

1月，在陸定一、林楓的授意下，教育部開始籌組理工農醫教材編審委員會。蔣南翔提出的編審委員的條件是：“付教授以上”，“學術水平較高，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按照這個條件，網羅了上千名資產階級專家、教授、“權威”，主宰了修訂教學計劃、審定教學大綱和編審教材的大權。

2月，國家科委在廣州召開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會上資產階級專家教授惡毒攻擊大躍進說：“近兩年大學畢業生的質量降低了”，不少畢業生“不會拉計算尺”，“外文差勁”，“漢語也是詞不达意，錯字連篇。”他們鼓吹恢復舊中國的一套，“只要給大學畢業生以基礎知識的訓練就行了”。蔣南翔為之叫好，說什麼“這些意見可取”。在這以後，彭真、陸定一之流又提拔了一批資產階級專家、教授，擔任學校的領導工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一步牢固地統治着我們的學校。

5月到6月，教育部先後召開工科和理科教學工作會議。會上，蔣南翔等強調要按照《高教六十條》的精神，加強“三基”（即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限制勞動，並修訂出部分教學計劃，審訂出若干教學大綱，作為“樣板”。又重申要培養“高級建設人材”，完成“工程師”“專家”的基本訓練。

6月，蔣南翔提出“按考試成績的高低與考生報考志願的順序，從高分到低分，分段進行錄取”（也就是按考分分段，不問政治條件，高分段沒有錄取完，不准錄取低分段）的分數掛帥、智育第一的招考新生辦法，當年在全國實行。蔣南翔主持的“教育部第41次黨組會

議紀要”中，甚至提出不要政治，不要階級路線，說什麼“考試成績不僅是衡量學業程度的標準，而且通過成績，還可以看出學生政治品德的高低。因此，對考試成績在80分以上的考生，一般都應錄取。如因特殊原因不能錄取，要經我部同意”。與此同時，教育部又把分數掛帥、強調學業成績的《課程考試考查規程》重新撿了起來。這是補充《高教六十條》，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重要措施。這兩項成了排斥打擊工農學生的武器，使得大批工農學生不得入學，入學了也往往不能結業，中途被迫退學。

11月和次年2月，教育部分別在武漢、瀋陽召開中南和東北地區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培養提高師資問題座談會。會議對教師公然提出重業務、輕政治的要求。劉子載（付部長）竟然鼓吹什麼：“一個時期着重抓紅，一個時期着重抓專，不同時期可以有所側重”的謬論。會上還布置各校編制師資培養規劃，硬性規定在規劃中要提出幾年內多少人達到講師，多少人達到付教授、教授，誘惑青年教師走只專不紅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道路。

12月，教育部發出《關於1963年全國招收研究生工作的通知》，片面強調學業成績，提出了錄取時必須貫徹“寧缺毋濫，保證質量”的原則，大搞導師制，規定付教授以上才能帶研究生，讓研究生接受資產階級專家的熏陶。

在資本主義逆流猖狂活動的時刻，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深刻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再一次強調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毛主席的教導武裝了全國人民的思想，再一次吹響了向反動資產階級猛烈開火的進軍號，給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以有力的打擊。

## 1963年

繼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主席號召開展城鄉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毛主席主持下，制訂了“前十條”，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新五反”運動，有力地反擊了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進攻，煞下了歪風邪氣。這時候，出現了雷鋒的英雄事跡。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題詞，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大大推進了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

在毛主席的親切教導下，高等學校的廣大革命師生提高了階級覺悟，開展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運動，又掀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衝破重重阻礙，參加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在周總理的主持下，國務院及時發布了《關於1963年高等學校畢業生勞動實習試點工作的通知》，規定高等學校畢業生先參加生產勞動一年，然後再見習一年，並於當年進行試點。

但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仍然繼續進行復辟活動。劉少奇、鄧小平支持國家科委，搞了一個關於學位、學銜的制度，鄧小平還親自審查批准，由於毛主席的制止，才沒有出籠。教育部繼續大走專家路線，要各教材編審委員會召開一系列會議，修教學計劃，審教學大綱，編教材建設工作規劃。又組織會議，貫徹《高教六十條》的會議，編制“自然科學研究工作的暫行簡則”。鄧小平、蔣南翔還大肆鼓吹所謂“拔尖人精神”，編制“自然科學研究工作的暫行簡則”。鄧小平、蔣南翔還大肆鼓吹所謂“拔尖人材”的培養，不注意政治條件，專選業務上的“尖子”，進行精心培育，企圖使其成為資產

階級的可靠接班人。

10月，舉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劉少奇、周揚大講國內不反修正主義，並妄圖把反對修正主義的嚴肅政治鬥爭，引向學術批判的歧途。

## 第四個時期

(1964年以後)\*

自從1962年，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後，全國人民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勝利地開展了階級鬥爭，對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向黨的猖狂進攻，進行了英勇的反击。1964年，全國城鄉廣泛地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年夏，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展開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決戰，敲響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喪鐘。

在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過程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過問文化教育工作，連續對文化、教育革命問題作了多次極為重要的指示。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廣大革命師生，又重新掀起一場教育革命，向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發起了總攻。

但是階級敵人是甘心滅亡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頑固地堅持反動立場，反對革命，破壞革命，繼續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較量。他們在教育戰線上，繼續指使盤踞在高教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更加瘋狂地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千方百計抵制和破壞文化大革命。但是，革命的洪流是阻擋不住的，他們終於被革命的歷史車輪碾得粉碎。

這個時期，高教戰線上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集中表現為，廣大革命師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奮勇前進，堅持革命，步步勝利，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繼續頑固地堅持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反對革命，負隅頑抗，節節敗退。

### 1964年

1963年年底，毛主席就親自過問文化、教育的革命問題，指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

1964年2月，毛主席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春節談話，深刻地揭露了教育戰線上存在的矛盾，尖銳地指出：“現在的學制、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是很摧殘人的”，“都要改”；指出：“學制要縮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現在課文就是多，害死人，使中

\* 1963年年底，又分設高教、教育兩部，楊秀峯任部長、黨組書記，蔣南翔任第一付部長、黨組付書記；1965年以後，蔣南翔任部長、黨委書記。

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毛主席再次強調必須使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理論聯繫實際，指出：“學生沒有文化娛樂、游泳、體育運動是不行的”；提出學生不僅要下工廠農村的辦法，是突然襲擊，出偏題、古怪題，還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要完全改革”。毛主席反對讀死書的學習，指出“書不能讀得太多，……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

3月，毛主席在對鐵路二中報告的批示中再次指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7月，毛主席在《九評》中又提出關於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問題。

9月，毛主席在和毛遠新的談話中，強調“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學習馬列主義，“最主要的是到實際中去學習”，指示學生應該參加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此同時，毛主席向全國人民又發出了學人民解放軍，學大慶，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號召。

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和對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再一次燃起了教育革命的烈火。

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妄圖阻止革命歷史車輪的前進，千方百計地抵制和反對毛主席的指示，阻撓教育革命的發展。

劉少奇對毛主席的春節講話和對鐵路二中報告的批示置之不理，却於稍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別有用心地提出所謂“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又囂然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自居，說什麼“我們設想的勞動制度和教育制度，符合馬克思的話”，“我想，列寧講的也是這種又勞動又讀書，半工半讀的學校”，狂妄地把自己直接與馬克思列寧並列。

劉少奇的這種從法國的“勤工儉學”和美國的“半工半讀”販運過來的劉記“半工半讀”，是純粹的修正主義的貨色，是完全篡改了毛主席的教育方向，用以對抗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的。這一年中，他親自出馬到八個省市大肆推銷他的這個黑貨。他到處鼓吹“如果只辦全日制一種學校，那國家和群眾都負擔不起，只有採取自己搞飯吃，才能減輕國家和群眾負擔，又滿足升學要求”，“如果讓城市初中畢業生到農村去當農民，他們是不願意去的，如果下去以後仍舊有書讀，……他們就可能願意下鄉了”。又說：“半工半讀也要辦大學，可以招高中畢業生，也可以招初中畢業生，這樣六年不開工資，是很劃得來的”。他完全偷換了毛主席倡導的半工半讀的革命內容，打着半工半讀的旗號，推行修正主義的黑貨。

在劉、鄧的支持下，陸定一、楊秀峯、蔣南翔之流，赤膊上陣，反對最高指示。

陸定一攻擊毛主席關於教育革命的指示，叫嚷：“革命革下去會碰到困難，國內如此，國際也如此。國內陳獨秀、王明失敗過；三年災荒、瞎指揮、高指標、高征購也失敗過。以後肯定還會失敗，可以寫保票”。

楊秀峯就在傳達毛主席春節指示的高等學校領導幹部會議上，急急忙忙地拋出了“思想積極，行動穩妥”的抵制改革的口號。蔣南翔則指使黃辛白提出“三不動”（即學制不動、專業設置不動、教學計劃的大框框不動），來抵制毛主席的教改指示。以後楊、蔣大肆宣揚“穩妥論”。楊秀峯到西南活動，以抓文科改革為名，行阻撓改革之實。他說：“改革有一系列的問題，困難還在後面。要寫好大綱，編好教材，談何容易”，“不能搞亂，要穩妥”，“不要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他還別有用心地提出“對毛主席的春節談話，不要簡單化、

庸俗化去理解”。

蔣南翔在黨組會上也大肆散布反對改革的所謂“穩妥論”，說什麼“改革是個複雜問題”，“形式上左，不解決任何問題”，“教改有學術問題”，“大學的改革要與中學的改革聯繫起來”，一句話，蔣南翔想拖延不改。以後，蔣南翔又誣蔑沖擊舊教育制度是“干擦屁股的事”，還散布“我們學校與文藝界帝王將相占統治地位的情形不同”的謬論，公然同毛主席唱反調。更為嚴重的是，他在理工科教學會議上，糾集一批人，壓制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揭發，叫嚷“《高教六十條》是輝煌的文件”，“六〇年以來的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他竟然凶狠地想把會上揭高教戰綫階級鬥爭蓋子的人打成“反黨分子”，陸定一還親自出馬給他撐腰，硬把階級鬥爭的蓋子壓住。

同年夏天，舊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中等學校政治課會議。會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許立群等大反毛澤東思想。

儘管劉、鄧、陸、楊、蔣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百般阻撓，革命的群眾是聽毛主席的話的，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廣大革命師生，在毛主席春節談話以後，認真學習、領會最高指示，發出了改革教育的強烈呼聲，並沖破阻力，着手進行考試方法等改革。大批師生還積極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廠下鄉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受階級鬥爭的鍛煉。

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等校，首先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

## 1965年

上半年，高等學校革命師生掀起了大學毛主席著作，大學解放軍，進行教學改革的热潮。軍事院校舉行的軍訓器材展覽會，促進了高等學校教改的發展。這段時間內，高等學校革命師生在教學中開始引用毛主席著作，制作直觀教具，進行形象化、啟發式教學，對教材中的修正主義觀點進行批判。

毛主席在這時又對教育工作作了指示，再次強調學生健康的重要性。7月3日，他在《北京師範學院一個班學生生活過渡緊張健康狀況下降》的調查報告上批示：“學生負擔過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8月，毛主席在接見一個外國教育代表團時又指出：“現行的學制年限太長，課程太多”，教學上“採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啟發式，考試的方法是把學生當敵人看待，舉行突然襲擊”，“學生讀了課本還是課本，學了概念還是概念，別的什麼也不知道。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毛主席重申教育必須革命。

在教育戰綫上一派大好革命形勢的面前，劉、鄧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繼續負隅頑抗，垂死掙扎。劉少奇繼續大抓他的“半工半讀”，妄圖扭轉教育革命的方向。他多次作黑指示，提出“四四制是最好的半工半讀形式”。他含沙射影地攻擊毛主席，說什麼全日制學校的改革“看不準，千萬不要瞎指揮”。他伙同鄧小平極力反對縮短學制。劉少奇說：“高等學校的學習年限還要看看，質量不要降低，按必修課程所得出的總學時計算，該幾年就幾年，學完了就畢業，學不完加它半年、一年。”鄧小平說：“其實他們（指蔣南翔等）願意保留五年制，外面壓力太大，他們才撐不住了。”

蔣南翔在一次部長辦公室會議上，明目張膽地攻擊說：“學習毛主席語錄的做法是形式主義”；惡毒地咒罵：“不能把主席語錄當作白蓮教符咒來念。”他還指使幹部，收集所謂

引用不當的例子，攻擊毛主席語錄進課堂。他大肆反對學習解放軍，胡說“高等學校有自己的特點，解放軍的經驗不盡適用於高等學校”。

5月，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督促蔣南翔大抓所謂“優秀生跳級、跳班”和培養“拔尖人材”的工作，蔣派人到北京、武漢各地調查，寫了一個“關於高等學校學生學習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以“為國家培養又紅又專的優秀人材”作幌子，強調精心培養學業上“優秀的尖子”；以反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為名，反對貫徹階級路線。

6月，蔣南翔秉承劉少奇“要在大學文科畢業生中分配一批到縣以下基層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下去，不可能建設新農村”的黑指示，代擬了一個指示，提出兩年之內抽出×萬名畢業生到基層工作，準備“培養”為縣委書記的接班人，為劉少奇推行修正主義效勞。

7月，高教部召開高等工業學校基礎課程和技術基礎課程教材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蔣南翔幕後指揮，黃辛白出面反對在教學中學習毛主席語錄，反對學習解放軍，大肆攻擊毛主席春節講話以來的教學改革工作。會議簡報增刊第2號，極盡污蔑攻擊之能事，說什麼“在講課中片面引用毛主席語錄之風盛行一時”，“對教學中的問題估計過於嚴重，將過去的教学經驗一概否定，對新花樣則克相摹仿”，“在教學方法上機械套用實踐——理論——實踐的公式”，“對原有的教材亂扣政治帽子，一概否定”。他們把矛頭直接指向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大反毛澤東思想。

10月，陸定一在高等學校政治工作會議上，明目張膽地攻擊毛主席的“七·三”指示，說什麼討論一個減輕學生負擔過重問題“太窄了”，“這次會議討論的全是雞毛蒜皮”。

就在這一年和前一年冬天，北京大學的革命師生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揭發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平、彭珮雲等人大量的三反罪行，揭露了他們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大量材料，嚴重的威脅了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統治，劉鄧慌了手腳，連忙指使彭真、陸定一、許立群等直接插手北大社教運動，召開了所謂“國際飯店會議”，竭力庇護陸平、彭珮雲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瘋狂的反撲，大搞反攻倒算，殘酷鬥爭，竟長達七個月之久。這是1965年發生的一個極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他們妄圖用這種罪惡手段扼殺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並創造一整套鎮壓革命的經驗，推向全國，把高等學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納入他們的軌道，捂住高教領域中階級鬥爭的蓋子，繼續維持他們的資產階級專政。

## 1966年

上年9月，毛主席在一次黨中央的會議上，指出必須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11月，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本年2月，劉少奇批轉了彭真的“二月提綱”，妄圖把一場政治鬥爭引入純學術討論的歧途。

4月16日，彭真指使北京日報拋出“燕山夜話”的材料，玩弄“舍車馬，保將帥”的花招，妄圖蒙混過關。

4月17日，蔣南翔受彭真之命，急忙召開京津地區部分高等學校負責人座談會，放出“這是學術批判”的煙幕，並讓陸平介紹北京大學法律系查閱一千多萬字資料，寫出批判吳晗文章的“經驗”，企圖搞假揭發真包庇。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5月，中央政治局开会，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

5月7日，毛主席在给林彪同志的信中提出了彻底实现教育革命的宏伟纲领，毛主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5月8日，高炬、何明的文章发表，揭开了“三家村”、“四家店”的盖子。

5月13日，蒋南翔向全国高校发出第108号《高教简讯》，推行4月17日京津地区高校负责人座谈会用学术批判抵制政治斗争的阴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月25日，北京大学聶元梓等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戳穿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继续负隅顽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

6月1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广播聶元梓等同志的革命大字报，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地开展起来。

6月6日，高教部贴出了一批揭发蒋南翔的大字报。10日，这个盘踞高教界达十四年之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曾窃居高教部部长、党组书记达十二年之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秀峰，在1967年1月初，也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

6月以来，高等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相继揪出了一小撮长期统治高等学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机，提出并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向高等学校派出大量的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同时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们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搞白色恐怖，妄图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7月18日，刘少奇在教育改革会议上，全面反对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教育改革的伟大纲领，继续顽固地抵制和反对教育革命。

7月中旬，刘少奇指使中宣部新闻王陶铸，组织三个工作队，准备分赴中南、华东、西南地区，镇压各地文化大革命，并推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货，妄图把文化大革命引上歧途。

8月，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会议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十六条》，提出了“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付主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当前已进入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起总攻的伟大战役，通过这场斗争，必将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夺回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取的领导权，彻底粉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教育领域里的一切污泥浊水，荡涤得干干净净，建立起一整套新的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教育战线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把一切高等学校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 附录

### 人物简介

刘少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党内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

彭真：旧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大头目。

陆定一：旧文化部部长、旧中宣部阎王殿阎王。

林枫：前中共高级党校校长。

杨秀峰：原高教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扬：旧中宣部付部长，文艺黑线总头目。

蒋南翔：前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许立群：旧中宣部付部长。

杨述：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后调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陆平：前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

彭佩云：前北大党委付书记，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

略。

上海中医学院春雷编辑室补编

一九六七年五月



# 编 后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建国十七年来，在文化教育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始终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的。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

在史无前例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以无产阶级“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终于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揪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选编这份材料，目的是提供革命的同志对刘少奇、邓小平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时参考。

编者 一九六七年五月